

# 非常與日常：論季麒光與沈光文交遊始末 ——以東吟社之前、後時間為主要場域\*

王建國\*\*

〔摘要〕

永曆五年（1651），明末遺老沈光文（1612-1688）買舟途經海口圍頭洋，因遇颶漂流來臺，先後歷經荷蘭、明鄭及清代等政治權力的更迭，而在臺灣納入清朝版圖後，晚年生活發生極大變化。康熙二十三年（1684）仲冬，季麒光（1634-1702）來臺任首任諸羅縣令，就館之後，沈光文即來刺謁——11月9日晚，二人初晤於天妃神宮，若鍼投芥：「先生誦我江南詞，我讀先生海外稿」，此後，往來密切、唱和不輟，翌年，並共同成立臺灣第一個詩社「福臺閒詠」／「東吟社」，戮力推展文風，洵為臺灣文學史上之佳話。尤其，季麒光稱：「從來臺灣無人也，斯菴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又始有文矣」，沈光文則云：「余素承先生以余為海外一人，余亦以先生為海外知己」，二人惺惺相惜之情，由此可見一斑。本文希冀另闢蹊徑／新徑——運用「新眼光」、「新材料」與「新方法」：將以往研究視域與焦點從沈光文其人其作，進一步調整成為季麒光對沈光文的接受與詮釋上，同時探索及呈現以下兩點具有「互文見義」與「相互證成」的內容：其一、「非常」：季、沈二人之初識、〈沈光文傳〉立傳經過及其相關內容：來臺確切時間、應召與否及其形象書寫；其二、「日常」：以東吟社前、後時間為主，考察二人詩文往來倡酬情形，同時勾勒季麒光來臺宦情與沈光文晚年生活面貌。

---

\* 本文初稿〈「蕩紙為歌詩，素心自相矢」——論季麒光與沈光文之交遊〉曾宣讀於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國立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協辦「第五屆南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政治經濟文化核心的建立：早期南瀛（10-18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南，2017年10月20日），感謝會議論文評論人林淑慧教授講評。茲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審查意見，裨益論述更臻周延完善，特此申謝。

\*\*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關鍵詞：季麒光、沈光文、東吟社、諸羅縣、蓉洲詩稿、宦遊

## 一、前言

康熙二十三年，季麒光來臺擔任首任諸羅縣令，抵臺之初，即與明末遺老沈光文傾蓋定交，往來密切，相互交遊唱和，後來更超越政治藩籬，共同組成臺灣第一個詩社「福臺閒詠」／「東吟社」，戮力推展文風，開啟臺灣文學與文化的重要新頁。季氏在臺三年期間，留下質量俱佳之詩文，對於認識、理解季麒光來臺宦遊與清初當時臺灣社會、文壇與文化，乃至於沈光文晚年情境，皆有極為重要的價值與意義。緣於清代以降沈光文詩作多未梓行，或即便有少數作品刊行，如〈東吟社序〉與〈平臺灣序〉，但因內容往往與沈光文其人其事之認識相去甚遠或格格不入而備受質疑，<sup>1</sup>故無由拼湊綴或完整得見其在跨越清代以後的活動面貌，今賴季麒光《蓉洲詩稿》與《蓉洲文稿》出土面世，不僅得以進一步審視季麒光宦臺詩文內容及其在臺活動情形，且可藉由季、沈二人交遊詩文對沈光文其人其事及其晚年在臺生活面貌有更全面而深刻之認識：當中，除了可以清楚看到二人初次見面即傾心定交，之後往來互動更是頻繁、密切，並共同成立福臺閒詠／東吟社——幾近形影不離——外，似乎也可以看到沈光文極為積極活躍——「樂不思蜀」／「樂不思甬」——的一面，而此與以往對於沈光文遺民形象的認識實有極大出入。凡此，足見本文對於重新理解與評價沈光文其人其作實具有一定重要性。

唯此須強調及說明的是：首先，季麒光《蓉洲詩稿》與《蓉洲文稿》出土面世，對於沈光文其人其作可有更全面性的觀照。無獨有偶，沈光文入清之後最早

---

<sup>1</sup> 沈光文〈東吟社序〉與〈平臺灣序〉，過去不乏有人對其內容產生疑議，如盛成（1899-1996）註〈東吟社序〉所指出者，並認為當中字句：「康熙二十四年」、「歸于聖代」、「奉命來蒞」、「余自壬寅將應李部臺之召，舟至圍頭洋，遇颶漂流至斯……今二十有四年矣」等，乃經「酌改」或「略為節潤」者，見龔顯宗編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編——紀念沈光文誕辰 400 年》上冊（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2 年），頁 182。另見龔顯宗編：《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8 年），頁 139-140。對此，個人已由目前已有論者由季麒光〈《東吟詩》敘〉及其相關詩文，加以對照，證明沈光文〈東吟社序〉之真實性，見王建國：〈論沈光文與季麒光之交遊——以東吟社為主要場域〉，《成大中文學報》第 70 期（2020 年 9 月），頁 109-156。反觀盛成的諸多質疑，個人以為不乏是受到當時政治大環境的影響，並且，其「校改」內容——將沈光文其人其事形塑成當時社會環境所需要的歷史樣貌——多出於其個人主觀的認定，而較缺乏直接有力的客觀證據。

與最晚的兩篇重要序文：〈東吟社序〉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與季麒光《蓉洲詩稿》、《蓉洲文稿》，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又，仔細審視沈光文這二篇序文，當可清楚明白其遣詞用字與脈絡肌理，實乃「一脈相承」，且「順理成章」，並無任何乖違或可疑之處（二序相關內容之討論請詳後文），同時，二序之形式可謂若合一契：〈東吟社序〉末署：「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歲梅月，甬上流寓臺灣野老沈光文斯菴氏題，時年七十有四」，〈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末署：「康熙丁卯孟夏望日（筆者按：康熙二十六年〔1687〕陰曆4月15日），甬上年家教弟沈光文題，時年七十有六也」（康熙二十六年。另，二序相關內容之討論請詳後文）。另，經由《蓉洲詩稿》與《蓉洲文稿》內容可以得見季麒光離臺前夕，沈、季二人特地依循古人「臨別贈序」模式，為對方來臺及在臺詩文，分別撰寫序文：沈光文為季麒光寫下〈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季麒光則為沈光文寫下〈《沈斯菴詩》敘〉（目次作〈《沈斯菴詩文集》序〉），而這兩篇序文也都不約而同，相互指出對方才是自己的海外知音。就〈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而言，一方面，這是《蓉洲詩稿》諸篇序文之首，也是當中篇幅最長與談論最深者，不僅可見其份量與重要性，而且可見二人相互重視與珍惜之程度，另一方面，這也是目前所見最接近沈光文晚年的一段完整文字，對於理解其個人晚年心境，可謂彌足珍貴，尤其，對於理解沈光文與季麒光之結識、交遊過程，實有莫大裨益。再者，藉由季氏《蓉洲詩稿》與《蓉洲文稿》相關詩文，也得以略窺沈光文晚年生活面貌與文學活動，包含推測沈光文原唱詩文可能樣貌。此外，針對沈光文來臺時間種種疑雲與矛盾，個人以為尋繹季麒光記載沈光文的相關文獻可以發現：愈接近沈光文晚年的記載，明顯有愈見明朗、清楚的趨勢（撥雲見霧？後見之明？），而最明顯的莫過於二人為雙方詩文集所寫下的序文，本文正是據此重新論證沈光文實際來臺的時間及應召與否等相關問題。

其次，進入大清之後，沈光文只有少數文獻傳世：文中援用〈東吟社序〉、〈平臺灣序〉、〈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等，完全是材料本身的問題，而非個人刻意選擇的結果，相反地，本文已盡可能援引沈光文與季麒光第一手文獻材料作為論證之基礎，尤其，文中引述季麒光的相關話語，都再再得到沈光文的青睞與肯認，而且，季麒光各卷詩集，皆經當時重要文人鑒定（有關宦臺詩作各卷鑒定者，如卷3之吳閻彭定求〔1645-1719，康熙丙辰狀元〕、卷5之晉安高兆〔?-?〕與蘭陵黃永〔1621-1693，順治乙未進士〕、卷6之林雲會〔?-?〕，榜名李雲龍，康熙丙辰進士〕……等）及校閱，故當非向壁虛造之作。

本文將爬梳季麒光《蓉洲詩稿》與《蓉洲文稿》內容，探索及呈現以下兩點具有「互文見義」與「相互證成」之內容：其一、「非常：季麒光與沈光文初識前後」，梳理季麒光發現／發明沈光文之過程——從另一角度而言，這同時也是「沈光文的自我凝視／書寫與被凝視／被書寫」——包括季、沈二人之「初會」、「壽序」、「題跋」及「立傳」（〈沈光文傳〉載入史冊：季麒光《臺灣郡志稿》／蔣毓英《臺灣府志》）經過——當中，「初會」與「立傳」，分別可見沈光文的「自我凝視與被凝視」與沈光文的「自我書寫與被書寫」——而整個一系列內容主要涉及沈光文個人流寓離散的生命經驗與政治（國族）認同問題：來臺確切時間、應召與否及其勝國遺民／斯菴老僧形象書寫內涵、晚年對待大清的態度……等相關內容，同時，也一定程度牽動沈光文的歷史定位及文學（史）話語問題，當中，季麒光對沈光文的詮釋確立了沈光文在臺灣漢文學及文化上的始祖地位，而此一定位對臺灣文學史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衍繹與發展，無疑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換言之，倘若沒有季麒光的慧眼獨具，沈光文在臺灣文學史的地位如何，恐尚難以斷定；其二、「日常：季麒光與沈光文交遊過程」，以東吟社前、後時間為主，考察二人詩文往來倡訓情形，同時勾勒季麒光來臺宦情與沈光文晚年生活面貌；肇因於以往對於沈光文的理解與認識幾乎都仰賴並經由季麒光相關話語——零碎的片言隻語——而來，至於為何如此云云，卻往往不明所以，而今透過對二人交遊之實際考察，除了對此疑問有更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外，也可對二人日常生活面貌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換言之，季麒光對於沈光文之非常話語：文學話語及歷史話語內容毋寧是建立在二人詩文倡訓及實際日常生活往來的基礎上。茲可以圖示如下：

非常／季麒光與沈光文初識前後：初會、壽序、題跋、立傳

---

日常／季麒光與沈光文交遊過程：東吟雅集、詩文倡訓

本文擬從「日常」與「非常」兩方面，探索季、沈二人之交遊始末，毋寧認為這是一組認識及理解季、沈二人交遊既各自獨立且又相互補充的概念或框架，「日常」指平日、尋常，「非常」則指「非同尋常」，乃有別於「日常」的特殊歷史情境及語境。首先，就客觀形式而言，此可用以區別或處理文獻材料的不同屬性，「日常」以二人倡訓詩作為主，「非常」則以文章（序跋、傳記）為主。

其次，就（非常）實際意涵而言，乍看之下，季麒光來臺結識沈光文，二人傾蓋定交，受邀參與沈氏夫婦壽宴，再為沈詩題跋，進而為之立傳，似乎都是歷來文人交往的尋常友好行徑，無甚特別之處，唯本文強調鼎革之際，季、沈二位文人——宦遊，一流寓——不約而同面臨前所未有重大歷史轉折與變化，而於斯土相遇相識，鍼芥相投，進而共創時代新局、開展臺灣文學史的新頁，尤其，強調季麒光如何「『發現／發明』遺民／老僧——沈光文」的歷程（包括：沈光文如何說及說什麼，季麒光又如何回應沈光文，二者交互往返，進而形成沈光文的相關話語）：確定了沈氏來臺時間與不斷書寫沈光文其人其事，並塑造其遺民／老僧形象；當中不難想像，可能存在季麒光之當朝新貴與沈光文遺民處境間的政治張力與微妙關係，唯就實際情況而言，季氏詩文不僅沒有這層隔膜，文字之間反倒明顯流露其對沈光文遺民心境的細膩體會及刻畫入微。

就第一點「日常」而言，依目前文獻所見，對於沈光文其人其作之認識係建立在清代首任諸羅縣令季麒光的話語之上：季麒光是最早——同時也是最關鍵——肯認及形塑沈光文其人其作者，當中，除了撰作〈沈光文傳〉（早期可見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轉載）外，最為人耳熟能詳且津津樂道者，莫過於〈跋《沈斯菴禿紀詩》〉極力稱許沈光文：「從來臺灣無人也，斯菴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又始有文矣」。唯對於箇中原委究竟如何，尤其，關於季麒光與沈光文二人實際接觸與交流情況內容為何，歷來多未有詳細清楚的說明，本文將實際考察相關（新）文獻，證明季麒光對於沈光文的種種稱述實非空穴來風，而毋寧具有一定現實客觀的基礎。

同時，將進一步溯源與探索二人初識前後過程，側重季麒光發現／發明沈光文的過程，並呈現沈光文的個人境遇及歷史語境——如何藉由不斷「重寫」沈光文其人其事，「重塑」其遺民／老僧形象，進而顯豁「發現／發明遺民／老僧——沈光文」與「沈光文的自我凝視／書寫與被凝視／被書寫」的雙重意義，此不僅對於重新認識沈光文其人其作具有關鍵性作用，而且，對於後來闡發二人交遊的鏡像作用也別具意義；同時將梳理、檢視歷來文獻及相關論述，進而對沈光文來臺時間及應召與否的各種說法——當中不乏對沈光文的誤記與誤讀——重新提出個人的論證與詮釋，尤其，本文有意另闢蹊徑／新徑——運用「新眼光」、「新材料」與「新方法」（「互文見義」與「相互證成」）：將以往研究視域與焦點從沈光文其人其作，進一步調整成為季麒光對沈光文的接受與詮釋上，雖然這一定程度仍不免受限於文獻材料本身，但這又完全是探驪得珠且忠於文獻材料的作

法，同時也是對沈光文其人其作尋求更進一步的對話與理解：一方面，沈光文撰寫〈東吟社序〉時年事已高，加上可能受到當下政治意識型態的影響，故有些話語顯得曖昧不明及語焉不詳，另一方面，季麒光對沈光文的種種書寫與重寫，實具有第一義的作用與意義，不容小覷：季麒光後來以其與沈光文親密交往與深厚友誼為基礎，「再三」宣稱其話語具有一定的效度與信度：「（斯菴）謂余能讀斯菴之文，而并能知斯菴之人也」、「知先生者，惟蓉湖棘人」、「後之君子，有能識斯菴之詩者，亦當以余言為先資矣」，同時也對沈光文的生平作了更翔實的記載與更正，因此未嘗不可以視為是對沈光文個人說法的重新釐清與再修訂。尤其，本文進一步由二人序文，相互印證沈光文實際來臺時間及應召與否的問題。沈光文各項問題中，當以沈光來臺時間最為關鍵，可以說，其他相關問題，多圍繞此一問題而展開。職是之故，文中也一併疏理及澄清「二十餘年」與「三十餘載」／「三十年來」的問題：「浮沉寂寞于蠻烟瘴雨中者二十餘年」、「憶余飄泊臺灣三十餘載」及「在斯菴三十年來飄零番島」；又，前有論者曾援用沈光文所徑稱「李部臺」：李率泰（1608？-1666）招致之說，作為沈光文來臺時間的推算，本文對此有完全不同的詮釋觀點：除了於文中清楚說明李氏當於何時招致及沈氏應召與否外，另對於李氏相應的生平也將有一定說明。

就第二點「非常」而言，將以詩題形式上及內容上針對或提及斯菴者為主，並藉由詩文繫年（包括運用敘事學話語模式）考察二人交遊始末及其實際互動情形，冀能充分激發及再現季麒光與沈光文的進一步對話，同時勾勒季麒光來臺宦情與沈光文晚年在臺生活面貌。而因目前所見季、沈二人交遊主要以季氏詩文為大宗，相對而言，沈氏詩文只佔極少份量，故論題逕稱「季麒光與沈光文」云云，又肇因於季、沈二人大部份交遊詩文係透過季麒光的宦遊視角來進行書寫與言說，故毋寧具有一體兩面之意義：不僅能表達其當下宦遊心境與吐露個人內在心聲，而且往往也最能理解、體貼及確切闡釋沈光文晚年生活與心境。尤其，清朝將臺灣納入版圖，季麒光來臺擔任諸羅縣令期間（含滯臺一年），對於沈光文晚年生活有極大的影響；簡言之，沈光文因跨越大清的時空語境，猶如重新活了過來：入清之後正是沈氏——猶如躍躍老僧——最「雀躍」與「活躍」的時刻。唯不禁令人好奇的是，季麒光臨行前，曾以西伯之養安慰沈光文，恐非無的放矢，而沈光文是否也在相關詩文上協力大清？實值得賡續追索，以呈顯其入清後的全幅面貌。

目前關於沈光文相關研究已累積豐碩成果，<sup>2</sup>當中，又以個人〈論沈光文與季麒光之交遊——以東吟社為主要場域〉<sup>3</sup>最切合本文論題（下稱「拙文」）。拙文以為：「沈光文與季麒光二人之交遊，大抵可以依其整體內容分成：『倡訓：詩

<sup>2</sup> 茲舉其犖犖大者，臺灣方面如：寧波同鄉月刊社刊行之《沈光文斯菴先生專集》（1977）、龔顯宗編《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1998）（此後續增補為《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編——紀念沈光文誕辰 400 年》上、下二冊〔2012 年 11 月〕，當中並收錄其前此對於沈光文與季麒光研究論文多篇，諸如：〈文獻初祖沈光文〉、〈臺灣漢文化的播種者沈光文〉、〈論沈光文研究〉、〈沈光文與季麒光〉、〈由沈、季二序看東吟社〉……等）、劉昭仁《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2006）、王淑蕙〈從《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論季麒光宦臺始末及與沈光文之交遊〉（2011 年 6 月）、翁佳音〈史實與詩：明末清初流寓文人沈光文的虛與實〉（2013 年 12 月）、王建國〈論沈光文與季麒光之交遊——以東吟社為主要場域〉（2020 年 9 月）……等；中國方面如：潘承玉《南明文學研究》（第六章〈台灣海峽的詩群活動：南明區域文學研究〉）（2012）、張萍〈從《蓉洲詩文稿》探究沈光文生平事迹〉（2012 年 11 月）、吳鋒鋼〈沈光文入台時間考証〉（2012 年 12 月）、朱素珍主編《紀念沈光文論文集》（2014）、張萍、戴光中、張如安等著《沈光文研究》（2014）、樂承耀編著《台灣文獻初祖沈光文研究》（2015）……等。當中，明顯可見以 2012 年左右為研究高峰，蓋因沈光文四百年誕辰之故；同時，可見其研究焦點與視域轉移的軌跡：早年多關注沈光文其人其作，近年則有轉向季麒光與沈光文交遊（含二人共組東吟社）的趨勢。另，關於沈光文來臺時間問題，歷來各家說法不一，大抵言之，約有永曆五年（1651）、永曆六年（1652）、永曆十六年（1662）三種不同說法，一般而言，臺灣學者多採 1651 年，如盛成、黃典權、龔顯宗、施懿琳（另，楊雲萍主 1652 年，翁佳音主 1662 年），而中國學者多採 1652 年，如戴松岳、樂承耀（另，潘承玉主康熙二年〔1663〕10 月前後，張萍主 1658 年到 1659 年 7 月間，吳鋒鋼主 1651 年底，謝國旗主 1651 年 11 月下旬），且有不少說法因其另有研究焦點，又或作為張揚其論述理念之基礎，故只是一筆或幾筆匆匆帶過，而較缺乏具體文獻支撐甚或實質理論根據，本文正是在上述基礎上，盡可能提出論據與論證以進行論述。

<sup>3</sup> 王建國：〈論沈光文與季麒光之交遊——以東吟社為主要場域〉，頁 109-156。此外，先前相關研究，大都採用季麒光著，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之內容（下稱「李本」），唯經個人初步比對，發現季麒光宦臺詩作數量，遠超出「李本」甚多，且後者不乏有訛誤錯謬者，關於這方面全面性的整理及論述，未來當有專文或專書處理。如本文以為〈用陳易佩韻再贈沈斯菴〉係一組詩（兩首），「故明張司馬於浙中受法，有詩題湖上，斯菴遙傳而未見，予亦只憶其半首，為斯菴誦之。詩曰：『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于今有是非。』」云云，乃第一首末後附加之平抬小字。見〔清〕季麒光：〈用陳易佩韻再贈沈斯菴〉（二首），《蓉洲詩稿》（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上海圖書館典藏），卷 3，頁 16 上-16 下。凡此，亦可見本文實踐「新材料」之意義。



文往來』與『雅集：福臺閒詠／東吟社』兩大部份——東吟雅集為沈、季二人交遊之中介，而又可以『福臺閒詠』／『東吟社』為中心，將其分成前後三階段，第一階段：康熙二十三年／前東吟社時期（二人私下倡訓），第二階段：康熙二十四年間／東吟社時期（二人公開倡訓），第三階段：康熙二十五年之後／後東吟社時期（二人私下再倡訓）」，<sup>4</sup>唯該文主要以沈、季二人共組之「福臺閒詠」／「東吟社」為考察對象，今則欲在其框架及論述基礎之上，再藉由《蓉洲詩稿》、《蓉洲文稿》等重要文獻，探究東吟社前後二人詩文倡訓往來內容，並以季氏丙寅（康熙二十五年）謝事，分為前、後兩期，同時進一步說明「福臺閒詠」／「東吟社」對二人交遊具有重要中介作用，且與「三階段」構成有機脈絡的關係，從而證成及發明其說。唯須再強調及說明的是，本文實際論述及處理的各項問題，實已遠遠超過「三階段」云云，且本文與拙文是兩篇各自獨立且各有其脈絡肌理，但又可以相互延續與發明的論文：本文以季、沈二人交遊始末為主旨，且主要用以審視季、沈二人在東吟社以外的時間——之前與之後——往來交遊發展（雖然東吟社已非本文主要論述對象與範圍，但可作為對照之用，故仍具有相關性），故可闡發及補充拙文未盡（未竟）之處。

## 二、非常／季麒光與沈光文初識前後：發現／發明遺民／老僧——沈光文

沈光文一生有兩個重要時間點：甲申之年與癸（亥）甲（子）之間，而其正好代表沈光文前後兩種完全截然不同的政治與身份認同，一言以蔽之：遺民與非遺民，而從甲申之年到癸甲之間，政治動盪劇烈變化之際，其個人抉擇與形象亦有極大之轉變。首先，甲申（1644）是明朝（南明）的遺民：這明顯可由其一生追隨福王、魯王與桂王等南明諸位君主及大多數現存詩作窺得其心懷舊朝與恥仕新朝的態度與信念。其次，癸甲之間：癸亥（康熙二十二年〔1683〕）甲子（康熙二十三年〔1684〕）則是沈光文晚年生活充滿劇烈變動及戲劇性轉變的時刻，也是其一生遺民與非遺民的重要轉捩點——入清之際沈光文顯然已脫去遺民的舊服，而換上斯菴老僧專屬的道袍或袈裟（鄭經時改服為僧，故當下可能已半新不舊）與清帝國新民的新裝：當沈光文從「荒陬窮鄉之中」與「雕題黑齒之社」重新出現在清朝歷史舞臺上時，似乎已經從早期遺民的身份逐漸走了出來，而成為

<sup>4</sup> 王建國：〈論沈光文與季麒光之交遊——以東吟社為主要場域〉，頁 113。

一位年逾古稀之老僧。尤其，後來更成為東山題詠及開創東吟社的重要推手——沈光文〈東吟社序〉稱：「蓋臺灣之山在東，極高峻；不特人跡罕到，且從古至今絕無有題詠之者。今願與諸社翁，共創始之」，<sup>5</sup>乃明顯具有開創大清帝國海外新格局的意義，復且，似乎也成為不憚高呼「歸于聖代」、「聖天子」及以「康熙」紀年的帝國新民。當然，不可忽視的是，沈光文當下雀躍興奮、主動積極等異常行徑或反常舉止，實與其因鼎故革新而得以重回漢文化、文明的懷抱——尤其，結識季麒光等來臺宦遊文人，共組福臺閒詠／東吟社——不無關係。

更進一步審視實際的歷史發展，可知清廷連番對臺「經武緯文」的舉措，完全改變了沈光文晚年的境遇與生活：癸亥年中若無施琅（1621-1696）之「經武」——攻克澎湖，結束鄭氏東寧王朝，並極力上書——康熙帝稱：「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留下臺灣，沈光文極可能就此成為被歷史掩埋——徹底遭到遺忘或完全淡化——的遺民，而當清廷將臺灣納入版圖並派遣文武官員蒞止斯土前的一段「歷史真空期」：南明宗室與鄭氏家族都紛紛奉命遷回中土，當時閩浙總督姚啟聖（1623-1683）原本允諾資助沈光文回籍返浙，但後來卻因「疽發背死」，遂使其歸鄉之路完全中斷，當下沈光文可謂完全被清帝國給遺漏了：「總督少保姚公昔於會稽後海同王老人舉事，與斯菴友善，後知斯菴尚在，許贈資回籍。姚公死，其事遂寢，斯菴亦遂不能作歸計矣」；<sup>6</sup>又，倘若最後不是康熙接受施琅建議而於翌年甲子春將臺灣納入清帝國版圖，加上該年末又逢季麒光之「緯文」——宦遊來臺「發現」／「發明」了沈光文，並且大發熱心——唯恐其人其作湮沒不傳——而為其立傳載入史乘，沈光文幾乎可以說完全被歷史埋沒了。

準此而言，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及二十三年（甲子），無疑是沈光文晚年生活發生劇烈變動的關鍵時刻，同時也是影響其一生歷史評價的重要轉捩點。而沈光文〈東吟社序〉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兩篇序文，一再——不約而同——言及「癸甲」之內涵，顯見其對於沈氏個人而言，具有一定之重要性與意義，故有進一步審視及討論其內容之必要性。沈光文〈東吟社序〉云：

<sup>5</sup> [清]沈光文：〈東吟社序〉，見[清]范咸等修：《重修臺灣府志·卷22·藝文三》，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577。

<sup>6</sup> [清]季麒光：〈沈光文傳〉，《蓉洲文稿》（康熙三十三年刻本，上海圖書館典藏），卷3，頁36下。

閩之海外有臺灣，即《名山藏》中輿地圖之東港也。自開闢以來，不通中國。初為顏思齊問津，繼為荷蘭人竊據。歲在辛丑，鄭延平視同田島，志效扶餘；傳嗣及孫，歸于聖代，入版圖而納賦稅（中略）名公奉命來蒞止者多，內地高賢亦渡海來觀異境。余自壬寅，將應李部臺之召，舟至圍頭洋遇颶，飄流至斯。海山阻隔，慮長為異域之人，今二十有四年矣。雖流覽怡情、詠歌寄意，而同志乏儔、才人罕遇，徒寂處於荒陬窮鄉之中，混跡於雕題黑齒之社。何期癸、甲之年，頓通聲氣；至止者人盡蕭騷，落紙者文皆佳妙。使余四十餘年拂抑未舒之氣、鬱結欲發之胸，勃勃焉不能自己。爰訂同心，聯為詩社。（下略）<sup>7</sup>

沈光文一副老神在在／老僧在在，以「過來人」／「在地人」的姿態，從歷史記載——歷歷細數「臺灣」過往種種，以及現下歸於大清的空前盛況。這是目前所見沈光文進入大清帝國後最早寫下的一段文字，可以視為沈光文「絕處逢生」與「重見天日」——重登歷史舞臺——一個嶄新的開始，字裡行間透露沈氏在此番人雜處的蠻荒異域，因文化差異所造成難以排遣的孤獨與寂寥，加上早年在政治上曾遭受鄭經（1642-1681）的逼迫，故明顯流露著「今是昨非」與「悔不當初」之感。「何期」顯示係屬意料之外（對沈光文而言，顯然具有「時來運轉」及「否極泰來」的現實意義）——「癸甲之年」，正是癸亥（1683）、甲子（1684）之交，定鼎訖謨之事確立，故先有新朝「名公」與「內地高賢」到來，後又有騷人墨客紛至沓來，而使其壓抑鬱結已久的文學心靈終於得到發抒的管道——「四十餘年」應由甲申之變（1644）算起至該序所寫就之時間；唯當下重新回憶四十年前的前塵往事，反思期間所承受的種種遭遇，實不能不有所感觸與感慨——當然，從與新朝誓不兩立轉而與新朝同心協力、切磋唱和並且結為詩社亦不無曖昧之處。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文中之「歸于聖代」與文末「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歲梅月」（1685年陰曆4月），乃完全肯認康熙國朝，且又署名「甬上流寓臺灣野老沈光文斯菴氏題」，可見其已不再堅持明遺民、遺老身份，轉而以國朝流寓臺灣之野老——在野不在朝——自居，甚或不乏以超然遠舉之老僧自任。

唯此須先強調的是：畢竟沈光文天賜遐齡：「公得保天年于承平之後」（《結

<sup>7</sup> [清]沈光文：〈東吟社序〉，見[清]范咸等修：《重修臺灣府志·卷22·藝文三》，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下冊，頁2576。

埼亭集·卷 27·沈太僕傳》語），本文實無意以此抹殺沈光文一生志業，且個人以為遺民／老僧雙重形象並置或交融，方符合客觀歷史實情，而沈光文的形象也才得以完整、顯豁（詳下）。唯早期曾有學者以此重要關鍵詞句懷疑沈光文〈東吟社序〉之真實性，而今不論對照季麒光〈《東吟詩》敘〉及其相關詩文，抑或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均可釋然與釋懷。不唯如此，倘若再退一步，從現實政治角度來加以思索：當明鄭業已出降歸順，沈光文一介平民老翁在彼時現實體制之下又能有何實際作為，也不免令人懷疑，因此，其作品出現若干「官方話語」／「官樣文章」，似乎是「人情之常」，也「合情合理」，實毋須亦不必過於苛責。

### （一）癸亥／經武：沒有琢公，何來斯菴

季麒光即將返回中土前，沈光文特為季氏在臺詩文作〈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而這也是目前所見最接近沈光文晚年的一段文字，該序最末署：「康熙丁卯孟夏望日」；當中分述「癸亥」與「甲子」，與〈東吟社序〉「癸甲之年」若合一契：

癸亥，聖天子聲靈赫濯，島上效吳越之歸誠，使從前未通之疆域，悉入版圖，設立郡縣。甲子，先生從梅溪令簡調諸羅。<sup>8</sup>

文中輸誠歸命意味濃厚，較諸〈東吟社序〉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乍看之下，「聖天子」云云，似乎不類，唯此實非孤證特例（詳下），且較諸前引〈東吟社序〉云：「閩之海外有臺灣」以降云云，言論似乎更直接，尺度也愈顯開放。故不僅可見二序具有前後遞進之關係，且更加證明〈東吟社序〉具有一定之可信度。唯此究竟是寄人籬下裨益付梓刊刻的權宜之辭，抑或全然心悅誠服，實仍有待本文賡續爬梳與思索。又，從癸亥之前未通（中國）之疆域（海外），到甲子春納入版圖、設官分職（海內），進一步點出季麒光從福建梅溪簡調來臺擔任首任諸羅縣令。

沈氏二序之「癸亥」話語，實同條共貫，故大抵可以合理推測甚或確定「癸甲」正先後揭櫫「經武」：施琅癸亥渡臺（〈東吟社序〉稱：「名公奉命來蒞止

<sup>8</sup>〔清〕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收入〔清〕季麒光：《蓉洲詩稿》，卷 1，頁 1 上。

者多，內地高賢亦渡海來觀異境」）與「緯文」：季麒光甲子來臺（〈東吟社序〉謂：「至止者人盡蕭騷，落紙者文皆佳妙」），唯〈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是為了送別季麒光，故未再提及施琅任何片語。而季麒光〈沈光文傳〉則揭櫫施侯相關話語：

當斯菴之在廈門也，與將軍施侯為舊識，及侯安撫東寧，斯菴出謁，侯慰問夙昔。斯菴仍著僧衣，不改初服。<sup>9</sup>

故早在季麒光來臺之前，施琅即已捷足先登，發現了沈光文。因此倘若沒有施琅攻克澎湖迫使鄭克塽（1670-1707）出降，沈光文恐將賡續「不見天日」的生活。康熙二十二年 8 月 13 日，施琅率師登臺：「公駐節臺灣，宣命受降。克塽齎其印綬，封其圖籍，舉族西轅，文武以下，歸命恐後」，<sup>10</sup>故沈光文（仍）著僧衣出謁施琅應在此時。又，倘若沒有施琅來臺考察，親自走訪南北二路，上奏〈恭陳臺灣棄留疏〉，力主將臺灣納入版圖，則臺灣將無郡縣之設，季麒光後來自然也不會來臺。準此而言，施琅一來幾乎同時改變了臺灣的遭遇與沈光文晚年的命運，故沈光文〈平臺灣序〉末了極呼「聖天子」——高高在上，德配其位（天地）——海不波溢、德澤溥被，而以「大將軍」柔遠有方、重譯蒞止，收束全文，實其來有自，也順理成章：

聖天子在上，海不揚波，德其溥矣。大將軍柔遠，重譯來歸，功實懋焉。<sup>11</sup>

就寫作時間點而言，此是沈光文首度稱述「聖天子」，較諸〈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為早，而與之對舉的「大將軍」正是施琅，又，「柔遠」云云，實非阿諛奉承，揆諸施琅曾發布〈曉諭澎湖安民示〉、〈安撫輸誠示〉、〈諭臺灣安民生示〉、〈嚴禁犒師示〉等告示，對於安撫當時臺灣民心，有其正面積極的作用與意義。雖然如此，施琅畢竟戎馬倥傯，不久即班師回朝，而沈光文甫初出僧廬，故二人

<sup>9</sup> [清]季麒光：〈沈光文傳〉，《蓉洲文稿》，卷 3，頁 36 上-36 下。

<sup>10</sup> [清]季麒光：〈將軍侯生祠碑記〉（目次作〈將軍施侯生祠記〉），《蓉洲文稿》，卷 3，頁 12 下。

<sup>11</sup> [清]沈光文：〈平臺灣序〉，見 [清]范咸等修：《重修臺灣府志·卷 23·藝文四》，收入 [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下冊，頁 2667。

可能並無太多往來。凡此，沈、季二氏之言，多可以相互印證，顯見所言有根有柢，並非向壁虛造，尤其，二人對於新歷史的發展話語，似乎有著極高的共識與默契，而此將裨益賡續追索二人之初識與定交。

## （二）甲子／緯文：沒有蓉洲，何來斯菴

### 1. 初會：傾蓋定交——康熙二十三年 11 月 9 日

季、沈二人在臺相遇，不論對於季麒光來臺宦遊抑或沈光文晚年生活而言，都是一件極具重要且有意義的事，尤其，就文學史而言，更值得深入探討與重視。季麒光去臺之前，二人為對方詩文所撰寫之序文及詩作，如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與季麒光〈《沈斯菴詩》敘〉、〈別沈斯菴〉等，都不約而同提及彼此邂逅初遇該晚夜雨對床的情景，可見二人對此皆惦念不忘，而揆諸其描述也都絲毫不差、若合符節。又，從二人序文可見這對名士與老僧不斷稱呼對方為「先生」與當下實際的互動中，更可以明顯感受得到彼此對對方充滿敬意與珍視。季麒光〈《沈斯菴詩》敘〉提及：

余自甲子冬月渡海，倣居僧舍，即晤斯菴先生。見其修髯古貌，骨勁神越，雖野服僧冠，自非風塵物色。叩之，知為四明舊罔卿，當酉戌以後播遷鎖尾，卒乃遁跡海外，以寄其去國之孤踪者也。與之言，則咳吐風生，議論雲發，如霏玉屑，如瀉瓶水。當是時也，梵幢燈燄，兩窗烟冷，坐對午夜，若遇素交。及各出所著詩文相指示，並縱談宗旨內典，諸家外史，多所證可。<sup>12</sup>

二人四目交接之際，誠然是歷史性的一刻：藉由季氏之眼與視角——這是一雙見過沈光文的眼睛——得以清楚看見沈氏當時的裝束、形象、氣度與談吐自有其卓犖拔群之處，而「修髯古貌，骨勁神越」云云，可見早前的饑餓空乏並未使其喪志潦倒，反倒成就其一身風骨，又，從「僧衣初服」（會晤施琅）而「野服僧冠」（會晤季麒光），沈光文裝束似無太大改變，而且，「野服僧冠」適成為其先前躲避鄭經迫害及後來鄭克塽降清時的最佳保護色——就遺民角度而言，該身服色可

<sup>12</sup> [清]季麒光：〈《沈斯菴詩》敘〉（目次作〈《沈斯菴詩文集》序〉），《蓉洲文稿》，卷 1，頁 29 上。

謂保住其晚節，同時也可免於面對新朝的尷尬；而從縱談內典更可見其非喬裝作態，而是得其三昧。最值得留意的是，二人當夜讀詩論史極為投契，而沈光文談吐如流、咳唾成珠與議論風生，也給季麒光留下深刻印象。唯沈光文又是如何看見及看待季麒光，不免同樣令人好奇。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顯然有更多前後細節與個人心理上的描寫，尤其，二人會面之前，實經歷了一番波折：

仲冬八日，舟入鹿耳門，風濤大作，不克登岸，遣人假館於天妃宮。時余寄宿僧房，私念巍巍組綬，恐未必與野人相洽也。<sup>13</sup>

雖然這一陣突如其來的風濤，推遲並打亂了季氏上岸的時間，但也意外地將其推向了天妃宮，而「巧合」的是沈光文也寄宿在天妃宮的僧房（天妃宮是來臺與去臺必經的交通樞紐，究竟這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令人充滿想像的空間）——兩人竟同在一個屋簷／僧廬下，只不過面對這樣的「近水樓臺」，沈光文當下並沒有太多的欣喜之情，反倒因橫互於縉紳（官）與野人（民）間的身份差異——沈光文以一介村野平民自居——而使其內心又躊躇「未寧」了許久（沈氏係寧波人，然其一生總是浮家泛宅、顛沛流離，故〈感憶〉云：「暫將一葦向南（東）溟，來往隨波總未寧」，<sup>14</sup>乃不乏有自嘲調侃之意），而有趣的是，季麒光則謙稱「先生獨睨余，不以簿書鄙」，<sup>15</sup>二氏「謙以待人，虛以應物」，終為彼此的友誼奠定良好基礎；而見或不見的忐忑不安，翌日總算平息下來。沈光文賡續說道二人初次見面的過程與情況：

<sup>13</sup> 〔清〕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收入〔清〕季麒光：《蓉洲詩稿》，卷 1，頁 1 上。

<sup>14</sup> 〔南明〕沈光文：〈感憶〉，見《全臺詩》第 1 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 年），頁 56。此為裨益詩作引用及簡省篇幅起見，均引自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全臺詩》第 1 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 年），故不再標註詳細出版項。

<sup>15</sup> 〔清〕季麒光：〈壽沈斯菴〉，《蓉洲詩稿》，卷 1，頁 14 上。

第二日，先生就館後，即往謁上憲。至晚，抵神宮。余投刺，先生即過我，恂恂粥粥，絕無長吏氣，依然名士風流也。一語情深，定交傾蓋，相見恨晚。先生出舊刻示余，余亦以存艸呈教，過承獎譽焉。<sup>16</sup>

季麒光往謁上司極可能指臺灣首任知府蔣毓英（生卒年不詳）（府署衙門位於東安坊），返抵天妃宮後，沈光文一來投刺，季麒光即過訪相謁，未有絲毫怠慢。當中，沈光文顯得「迫不及待」之心理，恐非只是表面的客套恭維，而是其內心真實迫切的聲音。而季氏溫和謙遜與名士風範，終於讓沈氏卸下心防、一言定交：當下，季麒光 51 歲，沈光文 73 歲，堪稱忘年之契。

尤值得注意的是，當中二人見面時間與時機：「先生就館後，即往謁上憲。至晚，抵神宮。余投刺，先生即過我（中略）一語情深，定交傾蓋，相見恨晚」，深具代表性意義：季麒光白天忙於公務，晚上則與沈光文晤語倡訓，幾乎也成為此後二人往來倡訓交遊前期——季麒光丙寅（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月謝事前——之基本原型，如該序稍後復稱：「夫以新開之邑，諸事俱費經營，先生往來籌畫，日無停晷。至夜，即就佛前燈火共話平生，并授我以宗旨內典，先生蓋儒而淩於禪者也」。<sup>17</sup>二人當下更交換詩作品賞，只是，其詩文形貌迥然不同：季麒光是付梓之「舊刻」，而沈光文則是尚未付梓之「存艸」，又，季麒光對於二人突如其來的會面與通宵達旦的傾心交流，去臺之前曾形諸歌詠，詩云：「班荆風雨來天杪，燈下相逢驚獨早。一言執手即留連，千秋傾蓋摠懷抱。先生誦我江南詞，我讀先生海外稿。兩人証合在蒲團，僧窗夜瞰滄波曉」，<sup>18</sup>當中，「先生誦我」與「我讀先生」，可見二人鍼芥相投與磊落坦蕩，而「江南詞」與「海外稿」不只是文學上的契合：獲得彼此認同，更是心理上的投契：開啟對方視野。換句話說，「江南詞」與「海外稿」是一種投其所好的「對照記」：一方面，沈光文是廣義上的江南人，故閱讀過來人的「江南詞」正好可以撫慰其四十年來的鄉愁；另一方面，季麒光初來乍到，故可以藉由先行者的「海外稿」來認識（新）臺灣，而這樣交互誦讀，對於當下拉近彼此關係、稍解二人異國懷鄉之苦，乃至於日後更進一步詩文往來也有一定裨益。凡此，所展現的「文人相親」，終於為日後的

<sup>16</sup> [清]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收入[清]季麒光：《蓉洲詩稿》，卷1，頁1上-1下。

<sup>17</sup> 同前註，頁1下。

<sup>18</sup> [清]季麒光：〈別沈斯菴〉，《蓉洲詩稿》，卷2，頁5下。



文學活動拉開序幕。

準此而言，康熙二十三年 11 月初 9 日晚，季、沈二人初次相會、言說、誦讀、書寫於天妃神宮，某種程度而言，也是千載難逢的文學盛會與文學之夜——後來，福臺閒詠／東吟社雅集之「飲不卜夜，詩成次晨」，都要從此說起；尤其，季麒光〈僧窗夜雨和韻〉云：「宦跡蕭條坐上方，三更殘影悞年芳。寒潮水急紛魚火，夜雨風多暗竹房。蠻語驚心新夢冷，故園惜別舊愁荒。天涯此際同搖落，酌酒羞看白紵裳」<sup>19</sup>明顯係季氏來臺上岸後寄宿僧房之作，揆諸其對於當時周遭環境與當下心境之描繪，且字句中流露「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濃厚意味，推測其和韻對象極可能是沈光文，若然，季、沈二人詩文往來即肇端於此時此地，尤其，對沈光文而言，當下與季麒光相遇，堪稱是對其晚年生活改變最具關鍵性的一晚，此後，二人詩文往來與日俱增，而且將共創福臺閒詠／東吟社。

## 2. 壽序：舉觴稱慶——康熙二十四年 9 月 24 日

康熙二十四年 9 月，適值沈氏夫婦壽辰，季麒光（居喪期間）曾受邀參與壽宴，並受命撰有〈沈斯菴雙壽序〉，開篇即揭發序文緣由：「歲乙丑，前罔卿斯菴先生七十有四，菊月二十四日為先生懸弧之夕，而是月二十八日為孫太夫人六十歲壽辰。長君紹宏為先生夫婦羅長筵，考鐘鼓，稱雙壽觴。因東寧海域，山雨潮霞，茅烟葦月，塵沙寂寞之區，知先生者，惟蓉湖棘人，命介一言為侑」，<sup>20</sup>值得注意的是，季氏充滿自豪與自信——以「捨我其誰」之不二人選自居——完全不諱言對於沈氏之知。實際上，當下二人已相識將近十個月，且又同組福臺閒詠／東吟社。

之後，以天縱之才遭遇「晦暝薄蝕之時」，稱述文天祥（1236-1283）、陸秀夫（1235-1279）、謝翱（1249-1295）、龔開（1221-1305？）等南宋遺民及南宋詩人陸游（1125-1210），完全肯認沈氏遺民情操及作為時代中流砥柱之角色，<sup>21</sup>當中所展現不盡相同的遺民譜系——「多彩多姿」遺民的可能性樣態，正是對於沈光文的推崇，也給後來關於沈光文遺民論述留下一定詮釋空間。接著，稱許沈氏係名門之後，及其顛沛流離行跡與高風亮節行誼，<sup>22</sup>復以「鮑宣之妻」與「陶侃之

<sup>19</sup> [清]季麒光：〈僧窗夜雨和韻〉，《蓉洲詩稿》，卷 4，頁 33 下。

<sup>20</sup> [清]季麒光：〈沈斯庵雙壽序〉，《蓉洲文稿》，卷 4，頁 26 上。

<sup>21</sup> 同前註，頁 26 上-26 下。

<sup>22</sup> 同前註，頁 26 下。

母」稱孫太夫人之「相夫教子」。最末，集中著墨其福壽康寧之衲僧形象，肯認其體證得道。<sup>23</sup>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就時間前後或內容而言，這篇壽序也等於為後來〈斯菴列傳〉／〈沈光文傳〉預作鋪排。

### 3. 題跋：有人有文——康熙二十四年末左右

唯實際探索立傳之前，實有必要先重新思索〈跋《沈斯菴禠紀詩》〉（目次作〈跋《沈斯菴雜紀詩》〉）這段兼具文學與歷史的話語：

從來臺灣無人也，斯菴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又始有文矣。斯菴學富情深，雄於詞賦，浮沉寂寞于蠻烟瘴雨中者二十餘年，凡登涉所至，耳目所及，無鉅細，皆有紀載。其間如山水，如津梁，如佛宇神祠，禽魚菓木，大者紀勝尋源，小者辨名別類，斯菴真有心人哉！思古人飄泊棲遲，若杜少陵之在巴蜀，〈白鹽〉、〈赤甲〉諸詩；柳河東遷謫嶺南，〈石潭〉、〈鉛鉞〉諸記，皆從無聊鬱塞之時，發舒興會。其志愈苦，其文愈工，而人與地相為不朽。當斯菴在臺以一賦寓譏刺，幾蹈不測，故著述亦晦而不彰。及余來尹是邦，盡出其所藏以相示，謂余能讀斯菴之文，而并能知斯菴之人也。憶幼讀《西京雜紀》，載上林令虞淵《花木簿》，排名列目，使人有盧橘蒲桃之感。今斯菴此詩，雖云紀事紀物，而以海外之奇，備從前《職方》所未有，則是詩也，即古《國風》矣，烏可以不傳。<sup>24</sup>

首先，季麒光〈跋《沈斯菴禠紀詩》〉前有〈題趙素菴《紀夢》〉，後有〈跋趙素菴《客話》〉與〈跋《長安庖者說》〉（文中提及「林子奕」），而揆諸〈《東吟詩》敘〉，可知趙行可（趙素菴）與林子奕皆為東吟社後期人物（末署「康熙二十有四年乙丑嘉平」〔陰曆十二月〕），故推測這段跋文與〈《東吟詩》敘〉約略作於同時（二文具有一定內在肌理，詳下）：應是康熙二十四年底左右。

其次，起首「從來臺灣無人也，斯菴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又始有文矣」——「臺灣無人」與「斯菴／有人」、「臺灣無文」與「斯菴／有文」兩相對舉，具有強烈濃厚的漢文化意識形態：一方面顯得「四下無人」／「目

<sup>23</sup> 同前註，頁 27 上-27 下。

<sup>24</sup> 〔清〕季麒光：〈跋《沈斯菴禠紀詩》〉（目次作〈跋《沈斯菴雜紀詩》〉），《蒼洲文稿》，卷 2，頁 45 上-45 下。

中無人」，另一方面卻又強調「斯文在茲」——具有提綱挈領之效（全祖望〈沈太僕傳〉正是在此基礎上，稱：「海東文獻，推為初祖」），且與稍後「及余來尹是邦，盡出其所藏以相示，謂余能讀斯菴之文，而并能知斯菴之人也」構成緊密關係——再次強調自己才是實際接觸與真正理解來臺第一人沈光文的不二人選——推許、自許及相知相惜之情，可謂溢於言表，當中，無人／有人、無文／有文、能知斯菴之人／能讀斯菴之文：互文見義（人與文、文與人交相掩映），且層層遞進，而揆諸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云：「余素承先生以余為海外一人，余亦以先生為海外知己」，正是對於這段文字的積極性回應。又，當中所揭露文學超越政治的意涵：政治之須臾短暫與文學之恆久流長——可以沈光文〈東吟社序〉與季麒光〈《東吟詩》敘〉作為代表——值得深思與玩味。

再次，一方面，〈跋《沈斯菴禠紀詩》〉所稱內容與沈光文〈東吟社序〉云：「雖流覽怡情、詠歌寄意，而同志乏儔、才人罕遇，徒寂處於荒陬窮鄉之中，混跡於雕題黑齒之社」，幾無二致，且「人與地相為不朽」也呼應〈東吟社序〉所稱「地以人傳」（季麒光「謂余能讀斯菴之文，而并能知斯菴之人也」，由此又可見一斑）。另一方面，〈跋《沈斯菴禠紀詩》〉與〈《東吟詩》敘〉揭載：「臺灣地盡東南，遠接扶桑，不入職方，我國家廓清漲瀚，設官分邑，肇造洪荒，實紀載所未有也。自有此集而山川之淵府，節候之勾股，內外之疆索，蛟龍之窟宅，飛走之伏藏，艸木之苑枯，皆可譜形繪像，以備採風問俗之選。則鯁生之穎舌，不可參稗野之資乎」，<sup>25</sup>可謂不謀而合，換言之，除了流寓與宦遊的差異因素外，當下季麒光及東吟社同仁猶如踵繼沈光文早年的腳步，而且，此又與季麒光詩題所稱〈余至東寧，方謂知音和寡，結契無人。斯菴先生以慙遺一老，傾蓋投合。兩年以來，倡酬講論，教益良多。至於天水閒話、花月新聞，時出其緒餘，破我岑寂，殆如周黨歸來，重說漢朝者乎。及余謝事索居，先生殷勤注念，風雨之中以詩寄慰，始知道義心期，非同流俗，可無煩翟門之題矣。敬和來韻，以誌不忘〉，如出一轍，而此「知音和寡，結契無人」，不正是沈光文早前來臺的處境？準此而言，沈光文其人其作即具備了先驅（行）者／開路先鋒的代表性意義與重要性。

經由上述可知，季氏「從來」云云之稱許到「能知」云云之自許，實已經預示了季麒光本人是讓沈光文其人其作得以從隱晦不彰而昭明較著的首要人選，尤其，康熙二十四年底，清廷下令纂修《大清一統志》，故文末「今斯菴此詩，雖

<sup>25</sup> [清]季麒光：〈《東吟詩》敘〉（目次作〈東吟詩社序〉），《蓉洲文稿》，卷1，頁36上-36下。

云紀事紀物，而以海外之奇，備從前《職方》所未有，則是詩也，即古《國風》矣，烏可以不傳」，從職方與國風的宏觀格局與立場進一步申說，除了再一次肯定其重要性外，無疑也為稍後立傳預作準備。

#### 4. 立傳：萬古流芳——康熙二十五年

(1) 版本源流：蔣毓英《臺灣府志·斯菴列傳》／季麒光〈沈光文傳〉

甲、本同（形式）：〈斯菴列傳〉／〈沈光文傳〉

目前所見臺灣方志中，最早記載沈光文者，係蔣毓英纂修《臺灣府志·卷9·人物·縉紳流寓·斯菴列傳》（下稱蔣《志》），稱云：

沈光文，字文開，別號斯（期）菴，浙江鄞縣人。故相文恭公世孫，以副車恩貢，歷仕紹興、福州、肇慶之間。由工部郎中加太僕少卿。辛卯年，從肇慶至潮州，由海道抵金門。壬寅，八閩總制李公諱率泰聞其名，遣員致書幣邀之，斯（期）菴不就，七月，挈其眷買舟，欲入泉州，過圍頭洋，遇颶風，飄泊至臺，不能返棹，遂寓居焉。及鄭大木掠有其地，斯菴以客禮相見。鄭經嗣爵，多所變更，斯菴知經無能為，且以一賦寓譏諷，為忌者所中，幾死于□，乃改服為僧，入山不出；於目加溜灣番社傍教授生徒，兼以醫藥濟人。所著文有：〈臺灣賦〉、〈東海賦〉、〈槎賦〉、〈桐花賦〉、〈芳草賦〉及〈花草菓木禠記〉。<sup>26</sup>

蔣《志》稍前排列有：王忠孝（1593-1666）、辜朝薦（1598-1668）、盧若騰（1600-1664）、沈佺期（1609-1682）、李茂春（?-1675）等其他南明流寓人士，沈光文「敬陪末座」或肇因於上述諸人年紀輩份皆長於沈氏，且多已先後物故。唯此須指出的是，沈光文是上述遺民中最早來臺，也是來臺明遺民中堅持氣節最久與最長壽者，又是唯一一位真正跨越清朝統治者，且無論就後來的文學或文化影響力而言——乃至遭到歷來質疑、批評與攻訐的成份——無疑都是最大的。雖然蔣《志》〈斯菴列傳〉所提沈氏之作，今多已佚失不傳，但仍可由二人情誼合理推測或斷定：季麒光當下或更早讀海外稿時，應該看過沈光文上述臚列諸作。不唯如此，蔣《志》〈斯菴列傳〉該段文字也是季氏刻意留下來的，季麒光〈《沈斯

<sup>26</sup> [清]蔣毓英修：《臺灣府志》，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23-224。

菴詩》敘）云：

余將問棹北還，為斯菴作小傳，載入志乘，又恐其生平著述湮沒而不傳也，重為之序而弁之。後之君子，有能識斯菴之詩者，亦當以余言為先資矣。<sup>27</sup>

準此而言，幾乎可以確定蔣《志》之〈斯菴列傳〉正是季氏所云「斯菴小傳」，只是，「斯菴小傳」究竟如何產生？首先，個人以為季麒光刻意於沈光文生前為其立傳的主要原因，除了二人極為相契與熟識，故足以留下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外，實際上也受到康熙二十四年底清廷下令編纂《大清一統志》的影響。其次，個人以為「小傳」乃針對「大傳」而來，而「大傳」即是康熙二十五年，季麒光〈沈光文傳〉：<sup>28</sup>撰諸〈斯菴列傳〉（「斯菴小傳」）與〈沈光文傳〉敘述與文字幾盡相同或相似，唯〈斯菴列傳〉顯然較諸〈沈光文傳〉精簡許多，故可以確定〈沈光文傳〉為原始版本，而「斯菴小傳」則因載入蔣《志》需要而加以剪裁、節錄之版本。緣此之故，季麒光〈沈光文傳〉最末以「現在進行式」云：「今年七十有五，尚雄於詩詞，文武執事之人皆敬禮之。嗟乎，斯菴雖未死，而晉處士、唐進士之稱亦可以無愧矣」，<sup>29</sup>可謂完全呼應康熙二十四年 4 月沈光文〈東吟社序〉所稱述諸多內容，尤其，經過福臺閒詠／東吟社前後一整年的雅集活動後，可知沈光文深受當時來臺文武官員的愛戴與敬重。

#### 乙、未異（內容）：來臺時間（辛卯／壬寅）及應召與否（將應／不就）

如前所述，〈斯菴列傳〉與〈沈光文傳〉二者關係密切，故蔣《志》〈斯菴列傳〉之「辛卯七月」出自〈沈光文傳〉，殆無疑義（詳下），唯其「壬寅，八閩總制李公諱率泰聞其名，遣員致書幣邀之，斯（期）菴不就」云云，因完全未曾見季氏任何文獻提及「壬寅」，故推測極可能是當初蔣《志》編纂過程中，同時參考了沈光文〈東吟社序〉的說法：「余自壬寅，將應李部臺之召，舟至圍頭洋遇颶，飄流至斯。海山阻隔，慮長為異域之人，今二十有四年矣」。<sup>30</sup>

若然，此又涉及〈東吟社序〉與〈沈光文傳〉兩種完全不同文本屬性或載體

<sup>27</sup> [清]季麒光：〈《沈斯菴詩》敘〉，《蓉洲文稿》，卷 1，頁 30 上。

<sup>28</sup> [清]季麒光：〈沈光文傳〉，《蓉洲文稿》，卷 3，頁 36 上-37 上。

<sup>29</sup> [清]季麒光：〈沈光文傳〉，《蓉洲文稿》，卷 3，頁 37 上。

<sup>30</sup> [清]沈光文：〈東吟社序〉，見[清]范咸等修：《重修臺灣府志·卷 22·藝文三》，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下冊，頁 2576。

的記載內容與詮釋脈絡：「將應」與「不就」二種說法存在極大差異性，而雖然〈東吟社序〉是沈光文的直接現身說法，故應當具有一定之可信度（至少壬寅至乙丑相距二十四年正確無誤），但也不免令人懷疑其可能性：沈光文究竟有何赴召動機——外在情勢轉變或受現實生活所迫？又，果真如此，則後來鄭氏父子、寧靖王及南明流寓人士紛紛來臺，豈不令其更形尷尬？且就其作為序文性質而言，此終究是屬於東吟社之創社緣起與活動紀錄，故承載其個人訊息或相對有限；當然，也不應完全排除此可能反應沈光文個人的政治焦慮。<sup>31</sup>

況且，實際上也衍生不少問題，最明顯的莫過於〈東吟社序〉此「天外飛來一筆」的「插敘」極為突兀，不禁令人懷疑其真實性究竟為何？一、其記載來臺時間是否正確？二、是否確有應召之事？反觀，季麒光〈沈光文傳〉是季氏後來有意識地寫作，且刻意「載入志乘」：為沈光文留下歷史紀錄，故相對於〈東吟社序〉而言，屬於「前修未密，後出轉精」之作，因此可見其詳細清楚交待沈氏遇颶來臺經過、在臺期間生活及其與鄭氏父子（作賦刺經）關係，對於後來認識沈光文生平及其形象的轉變極具關鍵性意義，故就其真實性而言實不容小覷。當中，不可忽略的是：隨著壬寅年（1662）中，永曆帝桂王及鄭成功（1624-1662）相繼辭世，反清勢力江河日下，明遺民在此後永曆朝／康熙朝的心境與行徑多少將產生轉變，而沈光文居此臺島，因目睹鄭經的所作所為，加之親身遭遇，其感受及思索應遠較其他遺民來得強烈而深刻，甚或有不盡相同之處（除了來臺不久即已物故的遺民外，如：寧靖王朱術桂〔1617-1683〕在鄭經主政時期，曾遭遇一段「授餐之典廢，視等編戶，無以資衣食；乃就竹港〔按：應正為「滬」〕墾田數十甲，以贍朝晡。鄭氏又從而征其田賦，悉索募應，困甚」<sup>32</sup>的日子，且晚年杜門不出，最後因鄭克塽降清，自縊殉國，而其二妾三媵亦相殉節；李茂春則於近郊：「州治之東」築夢蝶園<sup>33</sup>隱居耕讀……），而此番極為特殊之際遇及處境，當對其晚年之出處造成一定影響。

茲觀〈沈光文傳〉載云：「辛卯年，從肇慶至潮州，由海道抵金門，督院李公聞其名，遣員致書幣邀之，斯菴不就。七月，挈其眷買舟欲入泉州，過圍（團）

<sup>31</sup> 王建國：〈論沈光文與季麒光之交遊——以東吟社為主要場域〉，頁 109-156。

<sup>32</sup> 〔清〕陳元圖：〈明寧靖王傳〉，見〔清〕高拱乾等修：《臺灣府志·卷 10·藝文志·傳》，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082。

<sup>33</sup> 〔南明〕陳永華：〈夢蝶處記〉（下註：李茂春別墅），收入〔清〕六十七：《使署閒情》（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122 種），頁 120。

頭洋，遇颶風，飄泊至臺。及鄭大木掠有其地，斯菴以客禮相見。鄭經嗣爵，多所變更。斯菴知經不能用人，且以一賦寓譏諷，為忌者所中，乃改服為僧，入山不出，教授生徒，兼以醫藥濟人（中略）是時永曆假號于肇慶，斯菴復往從之。隨監鄭鴻逵軍事，又從揭陽來，旅寓於金門所。越十有餘年，而轉徙至臺灣。」<sup>34</sup> 值得注意的是其敘述順序：辛卯年先有李率泰（1608?-1666）<sup>35</sup>「遣員致書幣邀之」——此時，沈光文正在金門（否則若依〈東吟社序〉所稱，壬寅〔康熙元年，1662〕之年，沈光文正在臺灣，李率泰如何越過重洋招致沈光文，而沈光文又如何飄洋過海前去應召，恐怕都是更大的問題，故或疑係沈光文〔當時年事已高〕之誤記，因此後來才有〈沈光文傳〉之修正）——不果，復有七月挈眷買舟入泉州遇颶之事。唯其「越十有餘年，而轉徙至臺灣」，不論從「方其從魯監國始事越東」或「及錢塘兵敗」讀來，皆明顯有誤（詳下）：因不僅與前文敘述脈絡衝突、不合，而且也與沈氏實際遭遇不符，故也可能係季氏誤植或誤記。綜合以上沈、季二人說法，大抵可以確定李率泰確有招致之舉——倘若個人對於李部臺（率泰）推論或所論屬實，則此「歸于聖代」、「奉命來蒞」、「康熙二十四年」等辭彙，正「通同一氣」，也更加證明當下沈光文對大清的肯認；抑或反之：肇因於當下沈光文對大清的肯認，乃有此一連串「沆瀣相通」的用語——唯沈光文是否應召，甚或面對沈光文來臺時間種種矛盾與疑雲——沈、季二人在來臺的時間上有截然不同的說法——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或理解，恐怕都有再行深入探究之必要。

<sup>34</sup> [清]季麒光：〈沈光文傳〉，《蓉洲文稿》，卷3，頁36上-37上。

<sup>35</sup> 李率泰，字壽疇，漢軍正藍旗人，初名延齡，入侍努爾哈赤，賜名率泰，係明朝第一位降清將領李永芳（16世紀?-1634）次子。揆諸李氏一生重要經歷，多與殲滅福建的南明勢力有關。順治3年（1646）到5年間，曾於浙江與福建一帶建立軍功。辛卯／順治8年，適逢調吏部，拜弘文院大學士，因大學士（內三院）負有謀劃、招撫等事宜，故有可能於此際招降沈光文，而沈光文〈東吟社序〉稱「李部臺」（論者或以為倘若沈光文來臺時間為辛卯年〔1651〕，則其時間閩總制〔總督〕／浙閩總督當為陳錦，故主張非於該年來臺）、季麒光〈沈光文傳〉稱「督院」，毋寧也是以李氏一生最後也是最高的官銜稱之：自順治13年（1656）起，李率泰（原任兩廣總督），加太子太保、調閩浙總督（順治15年，分閩浙總督為二，仍專督福建，駐福州），迄壬寅／康熙元年（1662），期間曾多次招降、招撫與擊退鄭成功部將，此後直到康熙3年間，更是屢次招降及擊敗鄭經軍隊（康熙2年曾偕靖南王耿繼茂直搗廈門，取浯嶼、金門二島），最終並迫使其退守臺灣。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列傳》第2冊，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90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頁10027-10030／090-523-090-526。

首先，就沈光文來臺時間而言，個人以為可以同時結合兩種不同考察進路：其一、藉由文獻記載直接斷定其來臺之年（月），其二、藉由文獻記載沈氏停留在臺灣的時間間接推斷其來臺之年（月）。就第一點而言，大抵可以歸納為「壬寅」（1662）與「辛卯」（1651）兩種不同說法：前者主要以康熙二十四年之沈光文〈東吟社序〉為主；後者則主要以康熙二十五年之季麒光〈沈光文傳〉為主（另，沈光文〈寄跡效人吟·序〉云：「辛卯以來，借居海島」，<sup>36</sup>早年盛成對此說也有一定的論證）。就第二點而言，可以發現季麒光離臺（康熙二十六年 5 月望日之後）前夕，沈、季二人分別為對方詩文集寫下兩篇序文：〈《沈斯菴詩》敘〉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這是目前所見最接近沈光文晚年的兩篇重要文獻，而其相關內容也足以一定程度澄清或說明沈光文來臺的年代，故具有極重要的文獻價值與意義，尤其，倘若季麒光〈沈光文傳〉可以視為是對於早前沈光文〈東吟社序〉的修正與補充，則後來這兩篇序文不約而同提及沈光文來臺時間的長短，似乎也等於間接對前此二人說法的再修正與再確認，故可視為最後的「定讞」版本。

二篇序文內容不約而同重申其海外情誼，並一致肯認對方才是自己的海外知己，而二人「三十餘載」或「三十年來」云云——全祖望〈沈太僕傳〉同樣稱：「公居臺三十餘年，海東文獻，推為初祖」——更是若合一契：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云：「憶余飄泊臺灣三十餘載，苦趣交集，則托之於詩」，<sup>37</sup>而季麒光〈《沈斯菴詩》敘〉云：「在斯菴三十年來飄零番島，故人凋謝，地無同志（下略）」，<sup>38</sup>其「番島」明顯直指臺灣，如〈臺灣誌序〉稱：「臺灣海中番島，《名山藏》所謂乾坤東港，華嚴娑娑洋世界，名為鷄籠」，<sup>39</sup>可相互印證，而「故人凋謝，地無同志」正對應蔣《志·卷 9·人物·縉紳流寓》中來臺遺民紛紛離世或〈東吟社序〉所稱：「雖流覽怡情、咏歌寄意，而同志乏儔、才人罕遇，徒寂處於荒楚窮鄉之中，混跡於雕題黑齒之社」，<sup>40</sup>凡此，實足以支持沈光文於永

<sup>36</sup> [南明] 沈光文：〈寄跡效人吟·序〉，見《全臺詩》第 1 冊，頁 51。

<sup>37</sup> [清] 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收入 [清] 季麒光：《蓉洲詩稿》，卷 1，頁 1 上。

<sup>38</sup> [清] 季麒光：〈《沈斯菴詩》敘〉，《蓉洲文稿》，卷 1，頁 29 上。

<sup>39</sup> [清] 季麒光：〈臺灣誌序〉，《蓉洲文稿》，卷 1，頁 5 下。

<sup>40</sup> [清] 沈光文：〈東吟社序〉，見 [清] 范咸等修：《重修臺灣府志·卷 22·藝文三》，收入 [清] 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下冊，頁 2576。



曆初年即已來臺的說法，其中，又當以季麒光〈沈光文傳〉或蔣《志》〈斯菴列傳〉之「辛卯七月」（永曆五年，1651），可以得到最多歷史文獻的佐證與支持，故最具合理性與可能性，若然，沈光文「壬寅」來臺之說，即不攻自破。

附帶一提，早前季麒光〈跋《沈斯菴禱紀詩》〉云：「斯菴學富情深，雄於詞賦，浮沉寂寞於蠻烟瘴雨中者二十餘年，凡登涉所至，耳目所及，無鉅細，皆有紀載。其間如山水，如津梁，如佛宇神祠，禽魚菓木，大者紀勝尋源，小者辨名別類，斯菴真有心人哉」，<sup>41</sup>個人以為此語境應指涉該文稍後之稱述：「當斯菴在臺以一賦寓譏刺，幾蹈不測，故著述亦晦而不彰」，<sup>42</sup>（與前稱「及寄居山中」云云之語境不二）換言之，「二十餘年」應是沈光文作賦譏刺鄭經而避居山中之時間。又，如果沈光文不是在臺三十多年，則季麒光「從來臺灣無人也，斯菴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又始有文矣」之修辭強度，定當削弱不少。凡此，益加肯定沈光文「辛卯」遇颶來臺之說。

其次，就沈光文應召與否而言，經由上述考察可知沈光文「壬寅」來臺之說幾乎無法成立，則接下來需要進一步澄清的是「將應李部臺之召」是否可能的問題——某種程度而言，「應召」之說似乎隨著「壬寅」之說瓦解而淡化不少，唯面對季麒光「為賢者諱」（抗節）與沈光文「坦承不諱」（輸誠）截然不同的說法，究竟應以何者為是？個人以為最好的方式還是先回到季麒光〈沈光文傳〉所稱：「鼎革以來，遯跡不仕」的語境，思索其有何潛在現實動機或外在情勢轉變的可能性：倘若沈光文確實前去應召，則實在難以——幾乎無法——解釋其何以離鄉背井，揭檮反清復明大纛，並一路追隨南明諸王，最後竟然在一夕之間「翻然改圖」而前去投靠納降——沈光文〈大醉示洪七峰〉曾云：「只知作桀犬，降表竟莫為」，<sup>43</sup>尤其，不論沈光文輾轉金廈或飄泊來臺階段，都留下充滿濃厚遺民風格的作品，而季麒光不也正是親眼目睹這些作品，才得以進一步將其形塑為遺民典型，故「應召」的可能性不大；唯若說沈光文根本無此念想似乎也不太可能——否則為何要說「將應」？換言之，雖然沈光文表面未前去赴召，但內心恐非完全沒有過掙扎，尤其，「將應」本身顯得曖昧異常，故此「俛首自招」，或許是其內心曾經短暫浮現的念頭，然最後選擇「不就」。準此而言，「將應」云云，

<sup>41</sup> [清]季麒光：〈跋《沈斯菴禱紀詩》〉，《蓉洲文稿》，卷2，頁45上。

<sup>42</sup> 同前註，頁45上-45下。

<sup>43</sup> [南明]沈光文：〈大醉示洪七峰〉，見《全臺詩》第1冊，頁37。

恐怕只是一種符合當下政治現實的權宜性說辭。<sup>44</sup>唯面對以上種種稱述，究竟應該如何重新認識、理解甚或評價沈光文身份認同的問題，個人以為不妨再從其形象書寫入手。

## （2）形象書寫：勝國遺民（歷史定位）／斯菴老僧（現實生活）

關於沈光文個人身份及其形象——遺民／老僧／新民之變化與確立，可分別從沈光文（主觀）與季麒光（客觀）兩方面加以考察。首先，沈光文看待自己身份認同的轉變，可由其入清之後最早與最晚所撰寫的兩篇序文窺知，分別是〈東吟社序〉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二序對沈氏個人自我認同與形象之揭露有一定代表性與重要性——又，二序寫作對象（暗含讀者），一隱一顯，同樣指向季麒光；前者沈光文自稱「野老」，後者則自況「野人」，無論何者，皆泛指一般鄉民百姓（如「田夫野老」、「村夫野老」）或居處鄉野之平民（如「鄉里野人」）。其次，沈光文當下得以「重生」或「復活」，實與季麒光來臺密不可分，故季氏一路以來如何看待及形塑沈光文——透過季麒光之眼躬逢目擊其人其作及其先後對於沈光文之書寫，同樣值得留意：就其人／現實生活（現在進行式）層面而言，沈光文當下出現在季麒光面前時已是一名清臞老僧，且該形象一直持續出現到季麒光離開臺灣為止；就其作／歷史定位（過去式）層面而言，季麒光也在實際拜讀沈光文詩文——「先生誦我江南詞，我讀先生海外稿」、<sup>45</sup>「及余來尹是邦，盡出其所藏以相示，謂余能讀斯菴之文，而并能知斯菴之人也」<sup>46</sup>——之後，極力將其形塑為一介遺民，此可以分別就「來者可追」（親見）與「逝者已矣」（耳聞）兩方面加以稱述之。以下，為方便論述起見，先言後者，再言前者。

### 甲、逝者已矣（耳聞）／其作：勝國遺民（歷史定位）

就「逝者已矣」而言，此顯豁沈光文身份／政治認同轉變——遺民與非遺民（後遺民）的重要問題：如前所述，蔣《志》將沈光文置諸：王忠孝、辜朝薦、盧若騰、沈佺期、李茂春等南明流寓「遺民」行列中，但與之不同的是，季麒光為其立傳時，二人往來極為頻繁密切，而且沈光文本人也非常（異常？反常？）積極活躍，包括重新登上歷史舞台——成為大清帝國的子民——完全不憚與季麒

<sup>44</sup> 關於〈東吟社序〉書寫策略（包括開端「孟嘉落帽」是否是沈氏自我解嘲、開脫）的討論，見王建國：〈論沈光文與季麒光之交遊——以東吟社為主要場域〉，頁 117-121、149-150。

<sup>45</sup> [清]季麒光：〈別沈斯菴〉，《蓉洲詩稿》，卷 2，頁 5 下。

<sup>46</sup> [清]季麒光：〈跋《沈斯菴禿紀詩》〉，《蓉洲文稿》，卷 2，頁 45 下。

光（蔣《志》之實際纂修者）一同高呼「聖天子」，故其身份可謂又與上述諸人不盡相同，這除了當初在編纂（方志）與撰寫（傳記）過程中，可能有季麒光的「便直行事」或「為賢者諱」（如對應召與否的問題多語帶保留）成份外，也進一步凸顯沈光文一生遭際及現實的複雜性（一方面，現實政治情勢之風起雲湧、詭譎多變，令人無從選擇，另一方面，沈光文本身性格之雙面性或多重性）及歷來對其認識與詮釋的問題。

目前對沈光文遺民身份的認識與確立，幾乎可以說是建立在季麒光——最早也最重要——的書寫上，姑不論其說法是否有「為賢者諱」的意涵，至少這是建立在二人實際認識與交往的共同基礎上所進行的歷史評價，故有一定程度的客觀性。而且，早在季、沈二人訂交之初，季麒光即曾為沈光文誦讀張蒼水（煌言）就義前詩作<sup>47</sup>——此舉極為細膩體貼，也定當勾起其遺民心理，而其背後毋寧代表當下對沈光文認同的看法。又，早在康熙二十五年季麒光正式為沈光文立傳（〈沈光文傳〉）之前受命寫就之〈沈斯菴雙壽序〉（康熙二十四年9月24日）也充滿濃厚遺民味道。稍後，〈沈光文傳〉更謂「海外遺民」云云。康熙二十六年，季氏離臺前夕之〈《沈斯菴詩》敘〉則稱「東海之遺老」，又，〈別沈斯菴〉以大篇幅筆墨概述沈光文浪跡天涯、飄泊萍蹤的一生，同時也再次肯認沈光文遺老（遺民）的身份：「先生蹤跡六十年，間關百折朱厓道。飄泊空憐失路身，海水如心自皞皞。帝子靈旗不可攀，鯨鯢夾鬪山河縞。棲遲杜老不能歸，新蒲細柳思豐鎬。東寧片石首陽山，猶許春秋遺一老。看人翻復雲雨多，胸中齒齒嗤翁媪。吁嗟俗眼侮老成，寧知周黨非傭保。楚客誰留衰鳳哀，葉公未識真龍好。五色明珠何處投，千金書卷難為飽。籬邊漫種東陵瓜，灑西數畝愁禾稻。閒讀蘇耽肘後方，荊高涕泣無同調。丈夫失意莫逡巡，斫地哀歌仰天笑。萬里浮蹤不偶然，今情昔夢憑顛倒」<sup>48</sup>——唯詩末似乎有昨非今是、肯定當下國朝之意。凡此，可見其自始至終肯認及定調其遺民性格。

#### 乙、來者可追（親見）／其人：斯菴老僧（現實生活）

不論季麒光來臺、在臺抑或去臺，當下所見沈光文皆是「（斯菴）老僧」的形象（以下，依各文獻寫定時間先後順序排列），如：〈《東吟詩》敘〉稱：「福

<sup>47</sup> [清]季麒光：〈用陳易佩韻再贈沈斯菴〉（二首），《蓉洲詩稿》，卷3，頁16上-16下。

<sup>48</sup> [清]季麒光：〈別沈斯菴〉，《蓉洲詩稿》，卷2，頁5下-6上。

臺新咏何昉乎？始於斯菴老僧及渡海諸君子倡和之作也」<sup>49</sup>〈春王穀日，諸君子聚飲鎮臺署中，即以聚字限韻賦詩，人不一體，斯菴攜稿索和，雖不及廁席言歡，而良辰勝會，風流可再，因率筆賡續，以當紀言〉云：「座中老僧逸致閒，矍鑠年逾七十五。（下略）」<sup>50</sup>又，〈沈光文傳〉寫其裝束：「斯菴仍著僧衣，不改初服」，〈同沈斯菴、陳都督、鄭副使過彌陀室看春，值王參戎暨宰贊天、韓震西兩督護小飲竹下，即事漫賦和斯菴韻〉（二首之一）云：「將軍座上容題竹，老衲亭前好放杯。」<sup>51</sup>之「老衲」——與在座之「將軍」相對——乃指席上之沈光文。

再如兩段長詩題之稱述：〈積雨斷薪，向鳳山君索之，知斯菴老僧有同病也，詩以訊之。雖史雲之塵、邵公之臥，同一清節，然薄宦之淒涼與幽人之閒淡，則有間矣〉<sup>52</sup>與〈斯菴老僧一日寢食失平，□藥靜攝。余知而叩之，則為人治病，出門矣。昔五地菩薩遊於槃起之國，偶患濕熱，見國人有病，則以醍醐上藥，各往治之。具□慈悲，遂受如來印教。今老僧羈旅之踪，懸壺寄隱，是現藥王身而為說法也。然日為人療濟，而不聞有人作供養平等法。乃知老僧能活人，而人不能頂禮老僧，嗟嗟，捨己之芸，從井之救，余為老僧苦之。惟願如五地之行力，圓滿歡喜，証登妙果，則庶幾矣。因為詩以訊之〉<sup>53</sup>皆一再提及「斯菴老僧」或「老僧」。

<sup>49</sup> 〔清〕季麒光：〈《東吟詩》敘〉，《蓉洲文稿》，卷1，頁36上。

<sup>50</sup> 〔清〕季麒光：〈春王穀日，諸君子聚飲鎮臺署中，即以聚字限韻賦詩，人不一體，斯菴攜稿索和，雖不及廁席言歡，而良辰勝會，風流可再，因率筆賡續，以當紀言〉，《蓉洲詩稿》，卷2，頁24下。

<sup>51</sup> 〔清〕季麒光：〈同沈斯菴、陳都督、鄭副使過彌陀室看春，值王參戎暨宰贊天、韓震西兩督護小飲竹下，即事漫賦和斯菴韻〉，《蓉洲詩稿》，卷4，頁44下。

<sup>52</sup> 〔清〕季麒光：〈積雨斷薪，向鳳山君索之，知斯菴老僧有同病也，詩以訊之。雖史雲之塵、邵公之臥，同一清節，然薄宦之淒涼與幽人之閒淡，則有間矣〉，《蓉洲詩稿》，卷6，頁20上。

<sup>53</sup> 〔清〕季麒光：〈斯菴老僧一日寢食失平，□藥靜攝。余知而叩之，則為人治病，出門矣。昔五地菩薩遊於槃起之國，偶患濕熱，見國人有病，則以醍醐上藥，各往治之。具□慈悲，遂受如來印教。今老僧羈旅之踪，懸壺寄隱，是現藥王身而為說法也。然日為人療濟，而不聞有人作供養平等法。乃知老僧能活人，而人不能頂禮老僧，嗟嗟，捨己之芸，從井之救，余為老僧苦之。惟願如五地之行力，圓滿歡喜，証登妙果，則庶幾矣。因為詩以訊之〉，《蓉洲詩稿》，卷6，頁24上-24下。

〈《沈斯菴詩》敘〉則有初次見面「野服僧冠」之描寫（其時空背景應與〈僧窗夜雨和韻〉相同）。〈海行雜詩〉（八首之三）（下註：「再宿天妃宮」）云：「到岸身仍在，逢僧淚轉空」，<sup>54</sup>表面此僧雖非直指沈光文，然而其詩題特意著墨「再宿天妃宮」，正是其來時借館而與沈光文初晤之地，故此極可能是季麒光觸景傷情或睹僧思人。

### 三、日常／季麒光與沈光文之交遊：沈光文晚年生活寫照

季麒光與沈光文一言定交後，隨即展開長達三年的詩文往來。揆諸二人「倡訓：詩文往來」內容，可以明瞭二人詩作往來前後質量之變化，乃與日（年）俱增。而審視二人往來頻繁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所云：「越明年（筆者按：康熙二十四年），移署郡中，余亦卜居於外，交益親而情益摯矣（中略）先生來，始入城市披筆墨也」，<sup>55</sup>此稱完全符合康熙二十四年，郡守艸堂峻工的時間，如季麒光〈艸堂歌〉云：「太守治郡同治堂，經營規畫周如防」。<sup>56</sup>又如，康熙二十五年，季麒光〈壽沈斯菴〉云：「官衙寂如冰，一日常倒屣。論書肆網羅，究古別疑似。解帶發高吟，欣賞時撫几。艷艷山月涼，絮語傾漏指」，<sup>57</sup>再如，康熙二十六年，季氏離臺前夕作〈別沈斯菴〉，曾追憶二人交往點滴：「閒來過我坐花間，一聲咳吐迴飛鳥。古意新詩屬和酬，應劉顏謝供搜討。有時疎雨起竹林，叩角高吟天地小。有時月光深樹來，攜樽共挹鬚眉槁」。<sup>58</sup>凡此，皆可見沈光文時常進出官署，與季麒光吟詠咳唾、銜觴會飲的場景。

季、沈二人交遊，大抵可以丙寅（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月季麒光「謝事」為斷限，而分為前、後兩期，蓋此是季麒光在臺生涯之中點，而且大致符合康熙二十四年，沈、季二人攜手成立福臺閒詠／東吟社，季麒光以其縣令之尊獎掖後進與推展文風所具有之實質性意義，唯後來因其「謝事」緣故，東吟社即告曲終，故康熙二十四年既是東吟社鼎盛時期同時也是式微時期。<sup>59</sup>這一方面可以如實反應

<sup>54</sup> [清]季麒光：〈海行雜詩〉（八首之三）（下註：「再宿天妃宮」），《蓉洲詩稿》，卷3，頁20下。

<sup>55</sup> [清]季麒光：〈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蓉洲詩稿》，卷1，頁1下-2上。

<sup>56</sup> [清]季麒光：〈艸堂歌〉，《蓉洲詩稿》，卷2，頁23下。

<sup>57</sup> [清]季麒光：〈壽沈斯菴〉，《蓉洲詩稿》，卷1，頁14上-14下。

<sup>58</sup> [清]季麒光：〈別沈斯菴〉，《蓉洲詩稿》，卷2，頁5下。

<sup>59</sup> 王建國：〈論沈光文與季麒光之交遊——以東吟社為主要場域〉，頁111-113、134-148、151-152。

季麒光仕宦生涯前後期的重要轉變，另一方面也可以同時審視季、沈二人交往有何實質性變化，大抵而言，前、後期五大主要內容：「拜節」、「雅集」、「出遊」、「寄懷」與「贈別」，適由淺而深，也充分展現沈光文晚年生活的真實面貌，而後期大抵從東吟社同人雅集，又重新回到早前以二人為主之詩文往來，且因季氏卸除公務，二人有更多閒暇相互唱和，故詩作數量明顯增加不少。茲分別就前、後期內容概述之。

前期多呈現：同甘／「莫放春秋佳日過」之同歡同賞，主要內容以「拜節」與「雅集」（以東吟社為主）為主，當中可能免不了有一般客套或流於「形式化」的成份，但這在二人初識階段，實不失為建立情誼的重要方式與管道，尤其，當中多可見沈光文之率先酬唱，故具有象徵其從隱遁山林重新回到文明市井的意義，當然，對季麒光而言，也具有適應斯土環境的意義，其中，福臺閒詠／東吟社成立具有聯絡聲氣、凝聚向心力及提供公共文化網絡的意義：「幾幾乎漸振風雅矣」或「彬彬然漸開風雅云」，正代表從舊朝代、舊蠻荒進入新帝國、新文明的秩序中。

後期除賡續前期內容外，則更進一步呈現：共苦／「最難風雨故人來」之同憂相救，主要內容有「拜節」、「出遊」、「寄懷」及「贈別」等，當中，「出遊」以二人私下巡遊為主，可視為前期「雅集」擇勝尋幽之接續，而且，「寄懷」明顯增多，也代表二人情誼更加深篤（當返棹在即，季氏詩作更屢屢出現「逢君」、「知君」、「思君」、「憑君」等字眼），尤其，季麒光賠累謝事時，沈光文主動風雨「寄懷」，後來離臺時更一路冒著風雨「贈別」，由此可見後期交往不僅沒有「形式化」倡酬關係，而且雙方同樣因客居窮困的處境，而愈來愈加同理及關注對方現實生活，患難與共色彩極為明顯。

#### 1. 前期：同甘／「莫放春秋佳日過」——「蕩紙為歌詩，素心自相矢」

季麒光〈用陳易佩韻再贈沈斯菴〉係二人訂交後，最早在詩題上提及沈光文者，審視其詩作內容，可見季麒光之深情。詩云：

去國間關甚，東寧信所之。客踪貧未病，臣節苦逾奇。雨細零丁道，霜寒凝碧池。相看尋舊話，重記淞湖詞。（下註平抬小字：「故明張司馬于浙中受法，有詩題湖上，斯菴遙傳而未見，予亦只憶其半首，為斯菴誦之。」）

詩曰：『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于今有是非。』」（）

不謂干戈舊，天涯剩有人。好音交自古，真性語能珍。身共丹霞老，文成素練新。荒荒潮影白，此地幸相親。<sup>60</sup>

第一首娓娓道出沈光文去國間關飄零的遺民境遇，第二首則「化干戈為玉帛」，再次肯認個人來臺與沈光文相遇相親，尤其，第一首重提前塵往事並為沈氏誦詩，無疑是深刻同理沈光文的遺民際遇與超越政治藩籬的表現。第一首詩末所註係指康熙三年，張煌言（1620-1664）被執時，分別作有〈將入武陵（按：「武陵」當作「武林」）〉（二首之二）云：「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敢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sup>61</sup>與〈入定關〉（在懸壘。七月十七丑時被執作也）云：「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難容五岳住，一帆仍自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sup>62</sup>

當中「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分別指于謙（1398-1457）與岳飛（1103-1142）：于謙在明初土木堡之變後（英宗被俘），擁立代宗（英宗弟郕王朱祁鈺），戍衛北京，擊退瓦剌也先；岳飛則戮力抗金，保全大宋半壁江山。于謙（于氏墓）、岳飛（岳家祠）及張煌言三人皆葬於杭州西湖，故有「西湖三傑」之稱。又，「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于今有是非」之疊山指謝枋得（1226-1289）義不事元、絕食而死——因高堂老母在焉，故遲死，文山指文天祥從容就義。凡此，無非肯定斯菴之高抗遺民行誼。

季麒光為沈光文誦讀張煌言詩作，實著眼於沈、張二人同為南明抗清重要人物，又具有同鄉情誼及深厚的歷史淵源。沈冰壺〈張公蒼水傳〉云：「（甲辰年〔1664〕七月十九）公至寧波，方巾葛衣，乘肩輿而入；觀者嘖嘖嘆息，同於畫錦。入提督府顧盼，謂人曰：『此沈相國第也，我昔曾會文於此。今忽忽二十年後，不勝丁令威化鶴歸來之慟耳』」，<sup>63</sup>當中所稱沈相國是明朝萬曆內閣首輔沈一

<sup>60</sup> [清]季麒光：〈用陳易佩韻再贈沈斯菴〉（二首），《蓉洲詩稿》，卷3，頁16上-16下。

<sup>61</sup> [南明]張煌言：〈將入武陵〉（二首之二），《張蒼水詩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頁174。

<sup>62</sup> [南明]張煌言：〈入定關〉（在懸壘。七月十七丑時被執作也），《張蒼水詩文集》，頁173。

<sup>63</sup> [清]沈冰壺：〈張公蒼水傳〉，見張煌言：《張蒼水詩文集》，頁209。

貫（1531-1617），沈光文即其從曾孫（沈一貫族弟沈九疇為沈光文祖父），故季麒光〈沈斯菴雙壽序〉稱：「先生以四明舊閩，文恭世胄（按：沈一貫之諡號文恭）」，<sup>64</sup>又，季麒光〈沈光文傳〉肇端稱：「沈光文，四明故相文恭公世孫，字文開，別字斯菴」，<sup>65</sup>而蔣毓英《臺灣府志·卷9·沈光文列傳》亦云：「沈光文，字文開，別號斯（期）菴，浙江鄞縣人，故相文恭公世孫」，<sup>66</sup>可見季麒光對沈氏家族世系知之甚詳。而極為巧合的是，張煌言事隔廿年後重新步入沈相國府，又廿年後，季麒光為沈光文誦張煌言詩，定當勾起沈光文對於前塵往事及歲月鄉情的一番追憶，甚或將沈氏帶回江南歷史時空，寬緩其異地鄉愁。某種程度而言，這是季麒光「江南詞」的延伸，而其從沈光文的來時心路說起，可謂極為細膩體貼。凡此，同理與肯認沈光文海外遺民生涯，正是後來進一步為其立傳的重要緣由與基礎。

杜審言（648?-708）〈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云：「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sup>67</sup>季麒光來臺之後，對於臺灣／東寧春日的舒放景致同樣情有獨鍾。揆諸其福臺閒詠／東吟社「擇勝尋幽」雅集諸題：〈東山〉、〈擬春夜宴桃李園〉（分九青）、〈其二〉（和斯菴支字）、〈蝶夢園即事〉（分東字）、〈蝶夢園即事〉（分文字）、〈新綠〉（限微字）、〈殘紅〉（限香字）、〈新燕〉（分十灰）、〈其二〉（和蒼崖陽字）等，莫不呈現新入帝國版圖週年之新春氣象與欣欣向榮，尤其，沈、季二人更在結社肇端（福臺閒詠／東吟社）及結集有成（《東吟詩》）之際，分別撰寫〈東吟社序〉與〈《東吟詩》敘〉，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二人之「對話」（廣義詩文往來）；自此以降，年復一年，春意書寫愈來愈濃。唯不可忽略的是，一方面因季氏丙寅謝事，故此後春意書寫也明顯「變調」，另一方面，同樣肇因於謝事在即，故後來已不見相關雅集，取而代之的則是季、沈二人個別往來唱和。

康熙二十四年，季麒光首度在臺灣度過中秋佳節，唱和對象即是沈光文，〈中秋漫興〉（和斯菴）（二首）首度對沈氏道出個人的宦遊處境與思鄉、思親之情，詩云：

<sup>64</sup> [清]季麒光：〈沈斯菴雙壽序〉，《蓉洲文稿》，卷4，頁26下。

<sup>65</sup> [清]季麒光：〈沈光文傳〉，《蓉洲文稿》，卷3，頁36上。

<sup>66</sup> [清]蔣毓英修：《臺灣府志·卷9·人物志·縉紳流寓》，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上冊，頁223。

<sup>67</sup> [唐]杜審言著，徐定祥注：《杜審言詩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3。



雨過空庭暹晚霞，橫窗雲樹自堪誇。清樽殘夢悲棋局，白髮黃金老歲華。  
流水心傷非故國，倚樓人在即吾家。莫言海外秋風好，是處潮聲聽轉遐。  
不堪寂寞問笙歌，聽到番言字字訛。骨肉音疎悲夢遠，功名心拂恨秋多。  
青簾雲捲樽前翠，白袷風來座上波。漫說柳州飄泊盡，貞符新韻紀元和。<sup>68</sup>

詩題所稱「和斯菴」，不僅是形式上的和韻，就其實際內容而言，未嘗不也是當年沈光文漂泊來臺時的心情寫照，換言之，這不只是季麒光個人當下的感受而已，同時也體現了沈光文當年蒞止斯土的一段心路歷程。第一首頗以「晚霞」、「殘夢」鋪寫個人年華不再，末聯「秋風」云云，尤顯悲涼之意，不禁令人想起沈光文〈思歸〉（六首之一）云：「青海濤奔花浪雪，商飆夜動葉梢風」，<sup>69</sup>而「聽潮」云云，也不乏是沈光文〈懷鄉〉：「安平江上水，洶湧海潮通」<sup>70</sup>的翻版。第二首則完全延伸第一首「非故國」意涵，並表達此地與中土文化差異甚大，首聯正呼應沈光文〈東吟社序〉：「徒寂處於荒陬窮鄉之中，混跡於雕題黑齒之社」，而從當前笙歌、番言念及骨肉未能團圓，並將其歸咎於個人為功名所累，末聯更以柳宗元元和年間貶謫柳州況寫個人此趟宦遊有如遠適蠻荒——東寧儼然是更勝柳州之海外新柳州。整體而言，從「自堪」（自詡）而「不堪」（無奈），可謂每況愈下，而前後兩「悲」字，皆非僅止於一般之悲秋而已，或有點染個人宦途不順之意：「莫言」與「漫說」云云，實有說不得卻又不得不說之苦衷，而此雖是季氏個人身世的感嘆，豈不也是沈氏早前來臺之遭際？凡此，更見二人同病相憐與惺惺相惜。

此後，一直要到康熙二十四年末，季麒光才有〈除夕見雪和斯菴〉云：

西風涼雪漫相催，入樹驚花莫浪猜。為道普天占瑞到，故教著地送春來。  
樽前剪燭愁無酒，夢裏尋春憶有梅。水闊雲高空悵望，浮湘司馬敢言才。<sup>71</sup>

面對當下東寧春色、踏雪尋梅應是滿心歡喜，唯「樽前無酒」與「夢裏有梅」，虛實、有無對舉，則未免有悲涼之感，且末聯浮現退縮心理，一定程度也反映了仕途受挫。尤其甚者，翌日，康熙二十五年元旦〈再和斯菴〉云：

<sup>68</sup> [清]季麒光：〈中秋漫興〉（和斯菴）（二首），《蓉洲詩稿》，卷4，頁38上。

<sup>69</sup> [南明]沈光文：〈思歸〉（六首之一），見《全臺詩》第1冊，頁59。

<sup>70</sup> [南明]沈光文：〈懷鄉〉，見《全臺詩》第1冊，頁40。

<sup>71</sup> [清]季麒光：〈除夕見雪和斯菴〉，《蓉洲詩稿》，卷4，頁42下。

何須綵縷祝新年，自愧經生老服虔。書卷青氈猶躑躅，風霜白髮強流連。  
皈心漫學千乘侶，昔夢還依三絕編。雲日天南春信早，幾回惆悵鯉湖邊。<sup>72</sup>

當中，大好春光與風霜白髮形成極大反差，而此無非是書生本色所導致之仕途悵然失意。

〈春王穀日，諸君子聚飲鎮臺署中，即以聚字限韻賦詩，人不一體，斯菴攜稿索和，雖不及廁席言歡，而良辰勝會，風流可再，因率筆賡續，以當紀言〉是康熙二十四年末東吟社曲終奏雅後再一次——欲罷不能——大規模的「嚶鳴相召」。詩題開端揭櫫諸眾人聚飲的時間是（康熙二十五年穀日）陰曆正月初八日，地點在臺灣鎮臺衙署（後堂）；因季氏未能與會，故沈氏於雅集結束後主動來訪、索和，而季氏當下則率爾操觚賡續其作。又，詩題所述及詩作內容：「今朝高會愧追陪，芳辰總調驅馳悞。滿庭詞客授簡齊，栢梁筆札非吾故」，<sup>73</sup>正呼應沈光文〈東吟社序〉所稱：「鴻溪季蓉洲任諸羅令，公餘亦取社題相率倡和」<sup>74</sup>與「各據性靈，不拘體格」<sup>75</sup>云云。

前半段描述各與會者，除了武將及「江南趙生」未審何人（未見於東吟社前後期成員名單中）外，主要仍以前東吟社諸社員為主：「會稽有客」指陳元圖（易佩）、「陶生虬髯」指陶禎錫（寄菴）、「帳前艸檄」指後期加入東吟社並擔任首任臺灣縣丞（知縣佐貳官）之趙行可。唯後半段則以懸想示現聚焦於沈光文：「座中老僧逸致閒，豐鑠年逾七十五。詩情酒態兩淋漓，墨光夜夜燈前吐。偷桃竊藥筋力適，朱黃黑白生風雨。蓮池佛性三峯禪，初明痛哭通天暮」，同時書寫個人境遇：「自慚車馬老風塵，讀書五十猶盲蠹。我髭我腹兩皤然，銅符墨綬傷遲素。床頭雙劍暗龍泉，月白吳吟倦毛羽。雲海相逢意若何，蒼波浩渺欣良晤」，<sup>76</sup>當中，沈光文豐鑠逸態、夢筆生花、詩酒酣暢、或儒或釋……，<sup>77</sup>適與季麒光風

<sup>72</sup> [清]季麒光：〈再和斯菴〉，《蓉洲詩稿》，卷4，頁42上-下。

<sup>73</sup> [清]季麒光：〈春王穀日〉，《蓉洲詩稿》，卷2，頁25上。以下為簡省篇幅，僅在正文中第一次出現該長詩題時加以完全徵引，之後行文（含註腳）則以首句稱之。

<sup>74</sup> [清]沈光文：〈東吟社序〉，見[清]范咸等修：《重修臺灣府志·卷22·藝文三》，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下冊，頁2577。

<sup>75</sup> 同前註。

<sup>76</sup> [清]季麒光：〈春王穀日〉，《蓉洲詩稿》，卷2，頁24下-25上。

<sup>77</sup> 王建國：〈論沈光文與季麒光之交遊——以東吟社為主要場域〉，頁145-147。

塵碌碌、羈旅行役的仕宦生涯形成強烈對比。

## 2. 後期：共苦／「最難風雨故人來」——「風雨共酬酢，湖山恣遣排」

丙寅二月之後，一方面，季麒光面臨仕宦生涯的挫折與困頓，另一方面，沈光文也面臨現實生活窘迫的諸多考驗，但二人交遊並未因此中斷，反倒風雨同舟、同甘共苦，且因季氏謝事後，無官職公務羈絆，故有更多餘裕與沈光文彼此唱和、切磋詩藝及一同出遊。當下，季氏側寫沈光文晚年活動詩作明顯增多，且長篇詩題幾乎都是針對沈光文而發，益發凸顯二人交往之濡沫涸轍、體貼同心與情真意切——正所謂「宦難見真情／患難見真情」，同時，二人往來主要模式也從東吟社雅集重新回到以詩文直接往來為主，故也可以窺見東吟社後來發展的情況。不唯如此，二人風雨中長相掛念，如康熙二十五年末遭逢一場持續甚久之大風雨，季氏當時即有多首風雨托懷之作，其後又有共同出遊之作，而此早在二人結識之初及後來東吟社「（月有會）不辭風雨」即已奠定此番情誼，而且，這樣風雨無畏、形影不離的情況，一直持續到沈光文送別季麒光離臺為止。

這時期二人交遊往來仍延續前期對於臺灣特殊風景的著墨，唯更增添了風雨、霜雪的描寫，同時因賠累風波之故，也多了對早期「春秋佳日」的「變調」書寫，此際季麒光詩作多不諱言個人仕宦、功名之無奈，如：白髮蒼顏、囊篋蕭然……，並且徘徊掙扎於不如歸去與不能歸去之矛盾間，而流露一定的鄉愁與歸思，此與沈光文早期棲遲滯留臺灣的處境，竟有了一定的相似性，而此也正可以說明季麒光思鄉之情愈盛與「客」意漸濃時，何以毫無保留一盡吐露給沈光文，蓋其來臺停留最久，故也最能體會其當下心境。

季麒光〈余至東寧，方謂知音和寡，結契無人。斯菴先生以慙遺一老，傾蓋投合。兩年以來，倡酬講論，教益良多。至於天水閒話、花月新聞，時出其緒餘，破我岑寂，殆如周黨歸來，重說漢朝者乎。及余謝事索居，先生殷勤注念，風雨之中以詩寄慰，始知道義心期，非同流俗，可無煩翟門之題矣。敬和來韻，以誌不忘〉（兩首），乃丙寅二月謝事後，一番深刻之體悟。茲觀詩云：

自有天涯意，相看日轉佳。交情真始古，吾道談非乖。官以禪心拙，愁因詩思排。可憐今夜雨，淒切助離懷。

白雪留荒島，逢君意自佳。正期文字合，豈為俗情乖。風雨共酬酢，湖山恣遣排。荔枝香正熟，應許一開懷。<sup>78</sup>

此是六月（荔月）前後之作。詩題前半實呼應沈光文〈東吟社序〉云：「何期癸甲之年，頓通聲氣；至止者人盡蕭騷，落紙者文皆佳妙。使余四十餘年拂抑未舒之氣、鬱結欲發之芻，勃勃焉不能自己」；而且，〈東吟社序〉云：「人喜多而不嫌少長，月有會而不辭風雨；分題拈韻，擇勝尋幽」——二不：「不嫌少長」與「不辭風雨」幾乎也適用於季、沈二人之交遊，尤其，風雨既指當下現實，也指季氏個人仕宦風波，故也是一同走過風風雨雨。詩題後半則是肯認二人情誼，可見在時間及諸多磨難的淬鍊下，格外使其相互珍視。值得注意的是，「離懷」云云，可能反映其即將或正等待棹返中土，而從「離懷」（其一）到「開懷」（其二）正是其心境上的寫照與釋懷。此須說明的是：季氏「離懷」云云，或以為當下可以順利歸棹，唯後來則因賠累滯留臺灣一年，而得以與沈光文再暢敘天涯未了情緣。

康熙二十五年 9 月 24 日，係沈光文 75 歲懸弧之辰，季麒光有〈壽沈斯菴〉相賀，詩云：

人生重百年，所貴得其是。先生魯國儒，掉臂慣經史。致身早不成，棲泊在海渚。及余蠻天來，笑談無依倚。先生獨昵余，不以簿書鄙。官衙寂如冰，一日常倒屣。論書肆網羅，究古別疑似。解帶發高吟，欣賞時撫几。艷艷山月涼，絮語傾漏指。七十五歲過，瀟灑興彌旨。吁嗟少知音，寥落常如此。余本舊恨人，沉憂滯骨髓。兩見霜花黃，幸值庚申紀。蕩紙為歌詩，素心自相矢。茫茫大海東，位置余與爾。千古慎勿謾，悠然此流水。<sup>79</sup>

這是繼〈沈斯菴雙壽序〉後，季氏第二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為沈光文祝壽，兼具回憶、對話及期許性質。一方面可見二人往來極為熱絡：沈光文頻頻造訪，動輒一日數回，幾乎成為官衙常客，且滿腹經綸與意興風發；另一方面則又可見季麒光言必稱「先生」之知契——當中，「先生獨昵余，不以簿書鄙」再次呼應〈沈斯菴雙壽序〉：「知先生者，惟荅湖棘人」，又，「先生」與「余」可謂「同是天涯

<sup>78</sup> [清]季麒光：〈余至東寧〉，《荅洲詩稿》，卷 3，頁 16 下-17 上。

<sup>79</sup> [清]季麒光：〈壽沈斯菴〉，《荅洲詩稿》，卷 1，頁 14 上-14 下。

淪落人」，而此益加肯認二人之金石至交，尤其，「蕩紙為歌詩，素心自相矢」以降云云，更完全契合沈光文〈東吟社序〉之「爰訂同心」云云。

同年末，一場連日大雨，依然不能阻止二人聯繫情誼，季氏有〈積雨斷薪，向鳳山君索之，知斯菴老僧有同病也，詩以訊之。雖史雲之塵、邵公之臥，同一清節，然薄宦之淒涼與幽人之閒淡，則有間矣〉（二首），詩云：

九龍羈客不成歸，白袷青箱夢已非。積雨廚頭煙欲冷，何人為問舊珠璣。  
寂歷荒庭夜雨沉，知君此際有高吟。門前平日無人問，愁絕休驚壁上琴。<sup>80</sup>

詩題鳳山君係指鳳山縣令楊芳聲（生卒年不詳），面對當下斷薪，兩人似乎同樣有著乏人聞「問」的窘困，雖然季麒光與沈光文同樣具有范冉（112-185）甑塵釜魚與袁安（？-92）臥雪之高潔，但當中也透露薄宦之淒涼與幽人之閒淡，畢竟有著處境上之差異。第一首詩寫個人羈旅的窘況，尤其，當下滯留臺灣當更能深刻體會沈光文當年不能返鄉與告貸無門的煎熬，第二首詩以懸想示現——詩中稱「知君」：斯菴老僧（後來更有「逢君」、「思君」、「憑君」等），可見其熟稔程度——以懸想示現寫對方在淅瀝中有「高吟」之情貌，又正是一種相知相契。

康熙二十五年仲冬晦日：11月30日，臺灣（臺灣縣）發生一場數十年來未曾有之風雨，季麒光有〈仲冬晦日，風雨大作，詢之土人，皆云數十年來所未有。斯菴居此最久，詩以紀異，因韻和之〉之作：

重開天地象俱新，臘日西風急雨傾。龍市驚傳花信早，鯨城喜見麥秋真（臺灣十二月麥正花）。南迴日月煙初改，東逝波濤色正勻。莫怪霜飛同六月，應教晴轉萬家春（時適有盜案，多人鄉市稱冤，太守蔣公多所開釋，風雨正值公審日）。<sup>81</sup>

詩中「臘日」指臘八（12月初8日），「蔣公」指臺灣知府蔣毓英。雖然此時季麒光已經卸任，但心中仍掛念黔黎百姓，唯筆下著墨「雨過天青」之新氣象，也極可能投射個人賠累遭遇及期待沉冤昭雪的願望。

<sup>80</sup> [清]季麒光：〈積雨斷薪〉，《蓉洲詩稿》，卷6，頁20上-20下。

<sup>81</sup> [清]季麒光：〈仲冬晦日〉，《蓉洲詩稿》，卷4，頁44上。

大雨過後，季氏一行人共同出遊，〈同沈斯菴、陳都督、鄭副使過彌陀室看春，值王參戎暨宰贊天、韓震西兩督護小飲竹下，即事漫賦和斯菴韻〉（二首）云：

翠筴新聲次第開，相攜東郭看春來。將軍座上容題竹，老衲亭前好放杯。  
歲月自知多感慨，天涯猶許重徘徊。爭看海外風光早，為問籬邊幾點梅。  
小徑僧寮繞竹開，滿城春色此重來。半生事業悲駒隙，異地賓朋喜酒杯。  
是處韶華俱曲折，一時雲物好低徊。相逢並坐春風裏，歸路寒香帶落梅。<sup>82</sup>

季、沈二人與文武官員（不期而遇）趁著春和景明出遊東郭名勝彌陀室，可視為東吟社雅集尋幽訪勝之賡續，二詩一前一後以竹、梅交互點染、烘托，極寫海外早春風光，當中可見詩酒朋儕的風雅韻致與情感融洽：「並坐春風」／「如坐春風」，足見同僚情誼絲毫未受其謝事影響。雖然如此，在一片大好春光景物中，卻不免春色惱人——不見春風滿面與春風得意，完全難掩無可奈何的黯然神傷：當中可見季氏對於韶光荏苒與半生駒隙、仕途風波的感嘆，<sup>83</sup>又，由「重徘徊」與「重來」，頗有「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杜甫〈絕句二首〉之二）之深意。尤其，二詩末聯特寫梅經風雨寒霜仍然傲立，當中或投射季氏個人心境亦未可定。

〈祀竈〉（下註：用斯菴韻）對個人遭際表現得更加顯著：「生平書卷悞丹黃，宦海飄零淚弗遑。無力向誰衡數命，不才猶未棄君王。一爐香篆羞祈祝，半勺青泉敢獻將。為禱尊神重拂拭，循環消息好斟量」，<sup>84</sup>直陳個人宦海浮沉之莫可奈何，只好藉由農曆十二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之祭灶祈禱於竈神（筆者按：「君王」指「灶王爺」），期望來年宦途平順。詩中流露一定「盡人事，聽天命」之意。

康熙二十五年末，季氏有歲暮書懷之作〈除夕和斯菴〉，詩云：

漫逐塵埃許獨醒，千金寶劍向誰鳴。客心今夜消殘臘，身事明朝入首正。  
小榻琴樽燈影亂，寒城鼓角海風清。空囊羞說河汾策，何日生涯慰尚平。<sup>85</sup>

<sup>82</sup> [清]季麒光：〈同沈斯菴、陳都督、鄭副使過彌陀室看春〉，《荅洲詩稿》，卷4，頁44下。

<sup>83</sup> 王建國：〈論沈光文與季麒光之交遊——以東吟社為主要場域〉，頁147-148。

<sup>84</sup> [清]季麒光：〈祀竈〉（下註：用斯菴韻），《荅洲詩稿》，卷4，頁44下-45上。

<sup>85</sup> [清]季麒光：〈除夕和斯菴〉，《荅洲詩稿》，卷4，頁45上。

從中更可以感受居處之荒涼淒清及對於生計之憂心如焚。唯此詩是「風雨之作」重要轉捩點，自此以降，時序進入新春，加上季氏棹返在即，故心境明顯好轉許多，而值此「客心」漸增之際，其與沈氏之唱和也愈來愈密切。

〈丁卯元旦和斯菴〉云：

勝入年朝事更新，詩成丁卯又初旬（唐許渾以「丁卯」名集）。青氈如舊依然好，白髮從今著處勻。己分樽前羞阮籍，何須簾下問嚴遵（漢嚴遵善卜，能決人將來事）。蓉湖此際梅花早，綠酒紅燈夢愴神。<sup>86</sup>

從眼前情景與當下心境寫到蓉湖梅雪爭春，思念故鄉之情溢於言表，加上與不切實際的享樂仕宦生涯形成鮮明對照，實不無感慨與悔愧。

康熙二十六年大地回春，季、沈二人更以臺灣／東寧之春為對象，相互切磋詩藝。茲觀〈作詩一字疊用，宋人時有之。西冷李生以新詩相示，皆句有兩春字，遂與斯菴讀之。斯菴曰：「昔人花月詩即此一體，然必有所托意，雖標新領異，其中自有位置，非有意有字即便填入者也。」斯菴歸，即以一律惠教。因知老作家針線在手，別見體裁。客窗無寐，聊成二首，雖寄意於閨情旅思，而嚙語胡謔，未見其工，以質斯菴〉（二首），可謂春意盎然：

春來花氣浴春顏，黃鳥春聲春樹間。春雨春燈香影暗，春風春艸淚痕斑。  
樓頭春早春偏苦，塞上春寒春未還。最是春愁春夜永，幾回春夢繞春山。  
何處尋春春不歸，天涯春色點春衣。春連燈火春花冷，春入琴書春酒微。  
春艸春雲催短髮，春城春雨暗空幃。無端春思隨春去，獨客經春春事非。<sup>87</sup>

雖是遊戲之作，然疊用春字（連珠體）寄情託興——「有所托意」與「寄意於閨情旅思」（春夢、春事），且詩題「客窗無寐」與詩末「獨客經春」云云，故不妨將其視為在臺三春——春去春又來（張元幹〔1091-約1161或1170〕〈菩薩蠻〉云：「春來春去催人老，老夫爭肯輸年少」？）——之總結（三十二春，正好是沈光文來臺迄施琅攻臺的一段悠悠歲月，沈氏讀來定當心有戚戚焉），只是，二詩字裡

<sup>86</sup> [清]季麒光：〈丁卯元旦和斯菴〉，《蓉洲詩稿》，卷4，頁45上-45下。

<sup>87</sup> [清]季麒光：〈作詩一字疊用，宋人時有之〉（二首），《蓉洲詩稿》，卷4，頁45下-46上。

行間透露著幾許無奈，尤其，第二首末了「非」字，完全解消春意：終究春夢一場、春夢無痕。

〈元宵次日燈下漫賦〉（用斯菴韻）是季麒光在臺度過最後一次元宵的感懷。整體上似乎意猶未盡地延續著上一首「客窗無寐」的心境，極寫「客心難寐」及其百無聊賴的春情：

燈火天涯又此宵，連城蕭鼓倩誰招。何人尚揖三千履，有夢空留廿四橋。  
酒盡莫教辜夜月，詩成應許落寒潮。客心易感難容寐，為問春風第幾朝。<sup>88</sup>

首聯「又此宵」透露幾許無奈——與末聯「第幾朝」首尾相應，象徵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無盡循環往復，正是（上一首）客心三春之延伸。頷聯以三千珠履及揚州廿四橋，吐露其懷才不遇與思念故鄉。頸聯寫飲酒賦詩，酒盡詩成，氣勢恢宏。

季麒光離臺前夕，遭逢一場大雨，心中掛念的仍是沈光文，茲觀〈大雨和斯菴〉（二首）云：

積雨陰沉日色藏，高原烟冷暗牛羊。山前樹影當窗密，屋裏溪聲入夜狂。  
酒沸浮名愁自悞，燈昏舊夢逐人忙。知君此際誠相憶，為我重書療癖方。  
海暗潮荒破大河，曉窗風雨勢滂沱。瘴鄉雲滿無金虎，澤國雷高有瑞禾。  
閉戶閒刪新白髮，檢囊難問舊青囊。天涯卻喜同心在，為寄懷人得句多。<sup>89</sup>

從入夜（之一）寫到晨曉（之二），雖然雨勢滂沱不斷，二人反倒風雨益親。二詩首、頷聯皆寫「雨中即景」，頸聯著墨個人杜門景況，末聯則聚焦於二人之患難真情，可知二人心意相屬相契：一方面是福臺閒詠／東吟社「不辭風雨」的翻版，另一方面，也是前此「風雨之中以詩寄慰」之延續。

〈斯菴病後，余速其出門，約向殿中策蹇而來，竟爾不果，詩以訊之〉（三首）：

<sup>88</sup> [清]季麒光：〈元宵次日燈下漫賦〉（用斯菴韻），《蓉洲詩稿》，卷4，頁46上-46下。

<sup>89</sup> [清]季麒光：〈大雨和斯菴〉（二首），《蓉洲詩稿》，卷4，頁47下-48上。



休文今病懶，應為著書勞。咫尺憐秋水，難憑一騎招。  
野服偏宜馬，徘徊不下臺。恐從市上過，共說倒騎來。  
羨彼夔鑠（躒）翁，據鞍猶自許，何辭顧盼雄，揚鞭過深樹。<sup>90</sup>

雖是尋斯菴不遇後之懸想示現，但其想像有一定的現實基礎：沈光文（仍）勤於著述（「沈約病瘦」），且強健能騎乘（英姿颯爽）；因其後接續〈棧林偶步〉（二首），<sup>91</sup>故顯係季氏造訪未果後，自行前去散策，其據鞍之地當指「棧（仔）林」（今臺南市美術館2館〔中西區忠義路二段1號〕）一帶。

稍後，二人一道出遊，地點同樣在棧林附近，茲觀〈同沈斯菴棧林觀射，見少婦汲水〉（二首）：

日長風煖棧花明，漫試雕弓簇羽平。最是轆轤聲斷續，殢人春色井邊情。  
爭看彎弓射白楊，老人徒倚坐斜陽。紅妝南陌喬相望，斷梗應憐□□□。<sup>92</sup>

二詩上半寫觀射（棧林地近寓望園道署，該署設有觀射之處），<sup>93</sup>下半則著墨少婦汲水身影，實為難得一見之間情逸致，又，第二首聚焦於「觀看」：眾人爭看百步穿楊之熱鬧及緊張、斯菴老者坐看斜陽之悠閒與紅妝高處相望，可謂完全盡收季氏眼底，也構成一幅彼此涵攝、互為風景的有趣構圖。

一日（康熙二十六年秋），沈光文有恙，季麒光前去探病，〈斯菴老僧一日寢食失平，□藥靜攝。余知而叩之，則為人治病，出門矣。昔五地菩薩游於槃起之國，偶患濕熱，見國人有病，則以醍醐上藥，各往治之。具□慈悲，遂受如來印教。今老僧羈旅之踪，懸壺寄隱，是現藥王身而為說法也。然日為人療濟，而不聞有人作供養平等法。乃知老僧能活人，而人不能頂禮老僧，嗟嗟，捨己之芸，從井之救，余為老僧苦之。惟願如五地之行力，圓滿歡喜，証登妙果，則庶幾矣。因為詩以訊之〉（四首），詩云：

丙寅劫火六丁燃，綵字丹書運上天。君獨箋天攜肘後，秋風松木自依然。

<sup>90</sup> [清]季麒光：〈斯菴病後〉（三首），《荅洲詩稿》，卷5，頁1下-2上。

<sup>91</sup> [清]季麒光：〈棧林偶步〉，《荅洲詩稿》，卷5，頁2上。

<sup>92</sup> [清]季麒光：〈同沈斯菴棧林觀射，見少婦汲水〉，《荅洲詩稿》，卷6，頁24上。

<sup>93</sup> [清]季麒光：〈寓望園記〉，《荅洲文稿》，卷3，頁15下。

庀湯蒼叢亦慈悲，佛法醫方一總持。擔取橘泉飛不盡，無人復問下簾時。  
從來藥樹本醫王，印卻俱胝祇自忙。莫道丹房堪辟穀，籠中參桂幾能黃。  
為道金天醉力微，蟾溫免冷未全非。逢人漫說壺中藥，留取金丹好療饑。<sup>94</sup>

這無疑是最能體現及說明沈光文老僧形象（超脫早先遺民色彩）及其晚年生活者。一方面，側寫沈光文懸壺濟世，以醫藥活人，即使養病之中，依然奮不顧身、出門為人治病（「（又）善方藥，療治諸病」），其捨己救人（先人後己）、利益眾生，卻又不求回報，著實令人動容，故以五地菩薩（「極難勝地」）稱之，另一方面，季氏兩度稱「知」——「余知」與「乃知」，既是相知，也是相惜：憐恤不捨，故「好言相勸」，體惜之情可謂溢於言表。

季氏離臺前，撰有離情別緒之長詩〈別沈斯菴〉（七言古詩）。全詩以倒敘方式／追述示現回顧二人相識過程，前後六度稱「先先」——當可視作〈壽沈斯菴〉之延續——並展開一連串「先生」與「我」之對話：從當日登岸就館及僧窗剪燭寫起，繼而著墨二人日常往來及相處情況，接著以「先生」極寫斯菴一生羈旅飄泊，最終落腳東寧斯土，而以遺民自處的耕讀生活。最末先以先生頻頻垂詢關切帶出個人近況，再以疊句連稱兩次先生極寫其設饌相款之高情盛意與個人對未來再相會之殷切期待：

先生日日問我行，未賦離筵意如擣。如我辛苦難具陳，豈獨行裝顏色少。  
昨日題詩淚滿裾，今日緘書汗盈掃。慷慨經綸付逝波，誰從伏櫪呼腰裏。  
循環涼燠總尋常，漫向人前誇蜀藻。青氈鐵硯羞黃金，最憐無食棲荒島。  
先生先生愛我深，殷勤相惜還相禱。我今落落渡海孺，孤帆兩袖西風杳。  
餉我樽酒貽我詩，肝膽冰霜慎自寶。桃花楓葉兩披離，東指扶桑日色杲。

<sup>94</sup> [清]季麒光：〈斯菴老僧一日寢食失平〉（四首），《蓉洲詩稿》，卷6，頁24上-25上。其四首之一，係仿自錢謙益〈桂殤〉（四十五首之四十）云：「庚寅劫火六丁災，綠字丹書運上天。汝去箋天應乞與，絳雲樓閣故依惝」，見〔清〕錢謙益撰：《牧齋有學集》第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庫叢刊正編》本，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刊本影印，與《牧齋初學集》合刊本），卷9，頁83下-84上。又，該詩另作：「庚寅劫火六丁災，綠字丹書運上天。汝去箋書應乞與，絳雲樓閣故依然」，見〔清〕錢謙益撰：《牧齋有學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1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據清康熙二十四年金匱山房刻本），卷9，頁集115-597下-集115-598上。

人生亦似麋鹿羣，歡逢愁別悲哀艸。九龍秋水寄相思，芙蓉歷落湖煙遠。  
要約叮寧訂後期，百年未滿緣未了。何時白髮笑相迎，剪燭檢書重剝棗。<sup>95</sup>

字裡行間流露離情依依，同時透顯「你知我見」：「先生」知我、惠我，可謂情深義重（包括餞別隆誼盛情），而季麒光也不諱言其個人窘迫坎坷與囊空如洗，臨末明知機會渺茫，仍然要約後期——「百年未滿緣未了」最是語重情深，尤其，剪燭（西窗）云云，一方面當令彼此憶起二人初會之夜，另一方面也等於寄語沈光文棹返四明山水。

除了設宴餞別，沈光文後來更一路尾隨送別——猶如攀轅遮道——幾乎到了難分難捨的境地，最終則因風雨交加而不得被迫分開。唯二人仍賡續以詩寄情，一再延續此厚誼，可謂至情至性、情意綿綿。〈風阻安平，斯菴不獲渡江相訊，以詩寄慰，依韻答之〉云：

狂風滄水淙淙，有客愁開海上窗。自幸空囊辭瘴雨，那堪歸夢滯清江。  
孤燈對酒天難問，獨夜懷人淚未降。此去思君情更遠，樓頭詩句並州腔。<sup>96</sup>

狂風驟雨，進退不得，尤其，對於無端受風雨滯留，再次借題發揮表達個人清白（無語問蒼天），益增此行之孤況，最末以懸想示現肯認東寧為故鄉及彼此之高情遠意（劉皂〈旅次朔方〉云：「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再答斯菴寄懷之韻〉云：

最憐寂寂滯歸帆，客淚樓頭強自芟。雨急前灘烟似水，風高隔岸浪如巖。  
年華獨我羞千卷，生死憑君寄一函。為道相思渾未盡，潮聲別夢總淪淪。<sup>97</sup>

面對雨急風高，莫可奈何，卻也不免顧影自憐、抹淚揉眵。而此番離別（生別），極可能也是未來的生死茫茫（死別），故語重心長並叮囑莫忘音書，儼然白首同歸、生死不負的死生之交。

<sup>95</sup> [清]季麒光：〈別沈斯菴〉，《蓉洲詩稿》，卷2，頁5下-6下。

<sup>96</sup> [清]季麒光：〈風阻安平〉，《蓉洲詩稿》，卷4，頁48下。

<sup>97</sup> [清]季麒光：〈再答斯菴寄懷之韻〉，《蓉洲詩稿》，卷4，頁49上。

果不其然，當年中秋，沈光文即有贈詩，而季麒光亦有〈寄答沈斯菴中秋見懷之韻〉（下註：明舊太僕，流寓東寧），云：

片帆分首數歸鴻，猶記黃昏坐遠風。日月未消心自許，山川難隔夢為通。  
知君孤影仍天外，愧我愁顏獨淚中。珍重琴書無恙在，蒼髯綠酒此誰同。<sup>98</sup>

往事如昨，歷歷如繪，時（日月）空（山川）絲毫不能減損或阻隔其高情厚意。雖然二人別來無恙，但深切期許對方多加珍攝，唯以「孤影天外」（君）與「愁顏獨淚」（我）特寫彼此天各一方：一方面，沈光文滯留海外未歸，另一方面，季麒光當下在福州守制，且面臨家門離散的景遇，故使其末聯更具深意。唯翌年沈光文溘逝，此詩竟成二人最後遺響。

#### 四、結語：「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不相識」

明永曆五年，沈光文因一場颶風意外飄洋過海來到臺灣，並成為稍後來臺遺民中最享長壽者，而此高壽也使其晚年生活波瀾迭起。康熙二十二年與二十三年施琅與季麒光分別來臺，而二人這一來幾乎改變／改寫了沈光文的晚年／一生，康熙帝接受施琅建議將臺灣納入版圖，季麒光則來臺擔任首任諸羅縣——康熙二十三年11月初9日薄晚二人初會於天妃神宮——一方面與其唱和交遊，另一方面又為其作傳編入志書，並共同攜手成立福臺閒詠／東吟社，充分展現「文人相親」的一面：明末流寓文人與清初宦遊文人在海外斯島邂逅相遇及相知相惜，共創臺灣文學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話。

蔡思齋〈序〉云：「（前略）已而，移於海外新闢之臺島，萬里波濤，一身漂泊，則愈窮矣。雖然蓉翁窮於衣，窮於食，窮於晉接，窮于追呼，窮於室人之交謫，窮於殊俗之經營，而不窮於筆墨之所著述，連篇累牘，不啻錦繡珠玉之在笥積」，<sup>99</sup>此一方面揭櫫其「君子固窮」的人品及「窮而後工」的書寫，另一方面也透露如許的訊息：清初來臺官員中，罕見季氏如此大手筆者，故不論對於認識與理解季麒光其人其作、明清及清初臺灣文學／文化活動，乃至於建構及深化明末清初臺灣古典詩學及文學史，皆提供一個嶄新的切入角度與詮釋視野。

<sup>98</sup> [清]季麒光：〈寄答沈斯菴中秋見懷之韻〉，《蓉洲詩稿》，卷4，頁50下。

<sup>99</sup> 蔡思齋：〈序〉，收入[清]季麒光：《蓉洲文稿》，卷1，頁1下-2上。

季麒光宦臺詩文是認識季麒光在臺仕宦過程的第一手直接材料，也是認識沈光文晚年在臺生活極為重要的文獻。尤其，季麒光來臺發現／發明沈光文，可謂慧眼獨具，也深具文學史上的典範意義。季麒光在二人情誼的基礎上，一方面不斷為沈光文撰寫序文，一方面又為其立傳載入史冊——永垂青史／清史，當中，除了翔實敘寫其生平（世系）遭際、來臺經過、應召與否及當下在臺生活，也著墨二人之初晤定交、同組東吟社、往來倡訓……等，同時依其當下之見與未見，將沈光文形塑成勝國遺民與斯菴老僧兩種迥然不同的形象，且可見癸甲之年／鼎革之際正是沈光文從遺民（出世）到後遺民（入世）重要轉捩點，此後，斯菴老僧也不遺餘力於參與、建構大清帝國海外新文學／新文化。

本文爬梳二人往來詩文，大抵可見隨著時間推移，其詩文往返愈來愈加密切，而其交遊則可以季氏丙寅二月謝事，分為前、後兩期，且前期福臺閒詠／東吟社雅集活動及後期丙寅謝事之後，分別為其倡訓重要高峰。一方面，前期多可見季麒光之在地／本地書寫，後期則多可見其流露一定鄉愁書寫。另一方面，前期以室內靜態為主，如：沈氏時常前往官衙論書、唱酬、對飲……，同時也有東吟社之雅集出遊；後期則偏向以戶外動態為主，諸如：光風霽月看春尋梅、風和日麗騎馬策蹇、巡遊觀射及觀看少婦汲水……，而在面臨薄宦淒涼及風雨斷薪（貧病交迫）之際也以詩相慰問。

又，藉由季麒光與沈光文眾多往來詩文，可大致勾勒出二人交遊實際面貌，而且可以發現：沈光文入清後諸般行止，多積極主動而非消極被動，如：投刺拜謁、創立東吟社、樂於賦詩（索和）、義無反顧以醫藥活人……等，此與以往所認識南明時期之沈光文遺民形象實有極大差別。個人以為：一方面此須考量沈光文遺民色彩逐漸淡化的問題，尤其，與季麒光實際交往過程中，可以發現其已逐漸走出早前的遺民心態，而融入全新的帝國時空中，甚至也可以大膽推論：沈光文以賦刺鄭經後，即已（被迫）變服為僧，故鄭克塽降清時，其已不具遺民身份，因此沈氏當下似無或已擺脫政治認同的困擾，而這也是施琅及季麒光與之相會時仍著法衣僧冠——「何期癸甲之年」，竟會說得如此自然而無扞格（「『冠冕』堂皇」？）——的緣故。換言之，沈光文當下可謂「別開生面」：是一現在進行式的斯菴老僧，而非過去式的勝國遺民。雖然如此，當其面對新朝時內心不免還是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焦慮。另一方面，進一步與二人實際交遊情形加以合觀，又可見其超越政治樊籬，完全以詩文、道義相交；同時，沈光文也是最早肯定季麒

光在臺政績者。<sup>100</sup>可見在二人真心交往與相互扶持的過程中，沈光文實已走出早先撰寫〈東吟社序〉時的政治焦慮。

倘若季、沈二人共同組成「福臺閒詠」／「東吟社」，並先後撰述「異質同構」（「相互見異」與「互文見義」）及前後遙相呼應之「金聲」：〈東吟社序〉與「玉振」：〈《東吟詩》敘〉，深具「對話」意義與內涵，「故可視為二人詩文往來唱和的隱喻及延伸」，<sup>101</sup>可作為前期代表，則後期可分別再以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與季麒光〈《沈斯菴詩》敘〉為其代表。又，倘若前二序係對東吟社而發，則後二序無疑又在前二序的基礎上，針對二人往來交遊而作，因此更具私交上的意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等於為對方留存一份珍貴「海外」文獻紀錄。準此而言，二人前、後二序除了是一種以其詩文往來為基礎的對話，也同樣代表二人在臺友誼及詩文往來之「金聲」與「玉振」，換言之，二人交遊乃二序「一搭一唱」之延續，抑或，二序「一唱一和」竟是二人交遊之縮影。尤其，若就形式而言，早在沈光文與季麒光初晤當下——「先生誦我江南詞，我讀先生海外稿」——已可見二人同類相呼、同氣相求之「對話」，只是後來更衍為「同甘同苦」之相啣相濡（前期多「同甘」後期多「同苦」）與同心合意之深契，而此無疑又延伸並賦予〈東吟社序〉之「爰定同心」更深一層的意義。

唯更進一步而言，可以「福臺閒詠／東吟社」作為二人往後交遊及詩文往來之轉捩點——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意義，一定程度及意義上，也再次為季氏丙寅謝事之後奠定二人穩固交遊基礎，而且，其詩文往來唱和——「你一言，我一語」，可見形式與內容的精彩對話。乍看之下，這只是一般基本形式上的相應，似無任何特殊之處，然而，季麒光詩作屢屢藉由「間接引語」及「自由間接引語」（free indirect discourse），<sup>102</sup>以第三人稱敘述者揭櫫二人深刻情誼則不容小覷。一方面，季麒光〈壽沈斯菴〉與〈別沈斯菴〉不斷以「先生」云云（二人同樣敬稱對方為「先生」），帶出「先生」之高情厚誼及其與「我」之深刻交流（當中，〈別沈斯菴〉可謂〈壽沈斯菴〉之再發展，而從〈別沈斯菴〉更可見二人交往愈到後來愈有默契），尤其，後來季麒光詩作多稱：逢君、知君、思君、憑君——

<sup>100</sup> 〔清〕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收入〔清〕季麒光：《蓉洲詩稿》，卷1，頁1下-2上。

<sup>101</sup> 王建国：〈論沈光文與季麒光之交遊——以東吟社為主要場域〉，頁113、149。

<sup>102</sup> 有關〈敘事學話語模式〉「間接引語」與「自由間接引語」的說明與分析，請詳胡亞敏：《敘事學》（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90、92-94、96-102。

「非『君』莫屬」，則可見其知契與熟稔（義同生死）。

另一方面，二人交往後期可見：季麒光詩作急遽增加且出現許多極長詩題，對此可以進一步理解如下。季麒光對沈光文的詩作，一開始及後來都帶有中介（介紹）的性質，尤其，臺灣納入清朝版圖、設官分邑，沈光文因兼具「遺民」與「新民」之代表性，故成為大清帝國海外新土／斯土的特殊人物，加上受到康熙二十四年底清廷下令編纂《大清一統志》的影響，故季麒光一路有意／刻意為後人留下認識沈光文其人其作的線索，可以視作為其為沈光文立傳與撰寫序文之遺緒，凡此可見季麒光對沈光文的書寫明顯預留「暗含讀者」，尤其，囿於當時客觀現實條件限制，沈光文詩文未能付梓刊刻，故不可忽略季麒光作為「紀錄者」與「傳播者」之重要角色。

唯季、沈二人何以初次見面即契合無間、傾蓋定交？其又如何跨越政治樊籬而成為忘年之交？個人以為除了二人情投意合——沈光文主動積極（落花有意）及季麒光的深切期待（流水有情）之外，<sup>103</sup>其主要原因約略有三，茲述如下。

其一、就個人生命經驗與生活情調而言：二人有極為相近的人生遭遇與經歷，季麒光於壽辰時寫下〈降日漫詠〉：「淪棄三十年，致身苦不早」<sup>104</sup>與〈壽沈斯菴〉（七十五歲）：「致身早不成，棲泊在海渚」，<sup>105</sup>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復且，〈降日漫詠〉云：「稽雌來海陬，長慮漫浩浩。形影坐深宵，霜髻空潦倒」<sup>106</sup>（蔡思齋〈序〉稱：「萬里漂泊」云云）未嘗不也是沈光文早年來臺的寫照，如〈望月〉云：「望月家千里，懷人水一灣。自當安蹇劣，常有好容顏。旅況不如意，衡門亦早關。每逢北來客，借問幾時還」。<sup>107</sup>

尤其，二人在臺諸多遭遇與現實處境極為近似，可概括為一「窮」字，正如蔡思齋〈序〉所謂：「窮於衣」、「窮於食」。季麒光〈除夕和斯菴〉云：「空囊羞說河汾策，何日生涯慰尚平」，〈別沈斯菴〉亦云：「青氈鐵硯羞黃金，最憐無食棲荒島」，而沈光文早年來臺也經常有此窘況，如〈己亥除夕〉（永曆十三年〔1659〕）云：「年年送窮窮愈留，今年不送窮且羞。窮亦知羞窮自去，明

<sup>103</sup> 「落花」者，歷來有「花果飄零」之說，係沈氏流寓之象徵；「流水」者，諺語有「流水的官」或「流水縣官」之稱，乃季麒光宦遊之象徵。

<sup>104</sup> 〔清〕季麒光：〈降日漫詠〉，《蓉洲詩稿》，卷1，頁13下。

<sup>105</sup> 〔清〕季麒光：〈壽沈斯菴〉，《蓉洲詩稿》，卷1，頁14上。

<sup>106</sup> 〔清〕季麒光：〈降日漫詠〉，《蓉洲詩稿》，卷1，頁13下-14上。

<sup>107</sup> 〔南明〕沈光文：〈望月〉，見《全臺詩》第1冊，頁44。

朝恰與新年遇」，<sup>108</sup>〈東曾則通借米〉云：「邇來乞食竟無處，饑即驅我亦不去。甌中生塵興索然，飢風吸露望青天。窮途依人仍不足，自顧已忘榮與辱」，<sup>109</sup>可見沈光文早已是過來人。至於二人之「窮」，容或有政治認同與仕途坎坷之別——唯季麒光完全肯認沈光文的政治處境（本文亦然），故立傳時將其形塑為一介遺民——但二人畢竟同樣在臺灣「遭時不遇」：先後來臺經歷一番偃蹇困窮的考驗，而且，二人竟風雨不改、窮且益堅，進而超越政治羈絆，共同譜寫「藏諸名山，傳之其人」之作，而為文學史留下一段千古美談。又，季、沈二人往來交遊，可見其形影相隨相依，幾乎到了焦孟不離的地步，復且，惺惺相惜、情同魚水，呈顯「情與貌，略相似」的「鏡像」關係，再由二人往來針芥相投之詩文：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與季麒光〈跋《沈斯菴雜紀詩》〉、〈壽沈斯菴〉、〈別沈斯菴〉等，又可見其互文性（仿擬修辭）。凡此，更加凸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不相識」的深刻意涵。

其二、就客居海外蠻荒之心理層面而言：姑不論流寓與宦遊性質之差異，季、沈二人猶如兩顆飄泊久違的靈魂在「海外」邂逅相遇，加上當時臺灣蠻荒、尚未開化（蠻煙瘴雨、雕題黑齒……），故其客居心理極為相似，因此季麒光不僅屢稱沈氏「飄泊棲遲」，而且同樣以「飄泊」與「踪跡」稱述個人來臺宦途，加上其後來詩作多稱「作客」、「客心」而流露濃厚鄉愁，可見二人詩作之語境與歸趨幾無二致，如季麒光〈元旦再和蒼崖有感之韻〉寫其首度來臺元旦惦念親人的心情：「春色年華此日奇，丹茅綠樹已差齊。不堪舊話樽前淚（下註：燈下與韋念南話述生平），自愧浮雲紙後題（下註：縣令申請皆書名于年月下）。書劍飄零辜釋子，晨〔辰〕昏辛苦負山妻。蕭蕭佇聽南來鴈，帳裏燈花帶雨啼」，<sup>110</sup>幾乎也是沈光文早年棲遲斯土時之懷鄉心境。<sup>111</sup>職是之故，雖然二人來臺時間、動機與目的皆不相同，但同樣能深刻體會居此異地或作客他鄉或之痛苦與無奈，且可以發現季麒光與沈光文往來詩作愈到後來客心愈濃，故不斷以懸想示現點出：「蓉湖梅花」、「廿四橋」、「九龍秋水」、「芙蓉湖煙」等故鄉景物，因此，也就不難理解：何以季氏棹返中土前所作〈《沈斯菴詩》敘〉，末了同樣藉由懸

<sup>108</sup> 〔南明〕沈光文：〈己亥除夕〉，見《全臺詩》第1冊，頁38-39。

<sup>109</sup> 〔南明〕沈光文：〈東曾則通借米〉，見《全臺詩》第1冊，頁39。

<sup>110</sup> 〔清〕季麒光：〈元旦再和蒼崖有感之韻〉，《蓉洲詩稿》，卷4，頁34下。

<sup>111</sup> 〔南明〕沈光文：〈感憶〉，見《全臺詩》第1冊，頁56-57。〔南明〕沈光文：〈思歸〉（六首之一），見《全臺詩》第1冊，頁59。



想示現揭糞四明甬上（寧波）山色水聲，殷殷期盼沈光文能夠早日落葉歸根。<sup>112</sup>

其三、就整個文學史傳統及文化層面而言：雖不排除季麒光所云：「先生誦我江南詞，我讀先生海外稿」，當下或有二人「各盡所能」與「各取所需」的各自現實目的，然而雅好詩文與志同道合（以道義相結交），無疑才是二人相知相契最根本的原因，這在往後詩文往來的過程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二人先後透過詩文倡誦（個別性）與文人雅集（集體性），尤其，藉由共倡福臺閒詠／東吟社來聯絡並維繫海外情誼（季麒光稱「余至東寧，方謂知音和寡，結契無人」），而其如此以詩文作為交流媒介，背後毋寧有一個更深遠龐大的文學（史）或文化傳統作為其重要支撐甚或後盾，如蘭亭、金谷園、春夜宴桃李園、西園……等園林雅集，故又與一般酬唱贈答之徒具形式不同，加上二人往後在日常生活相互照應與禪佛宗教體證交流上極為密切，故更是水乳交融、契合無間。

---

<sup>112</sup> 〔清〕季麒光：〈《沈斯菴詩》敘〉，《蓉洲文稿》，卷1，頁30上-30下。

## 徵引書目

### 〔傳統文獻〕

- 〔唐〕杜審言著，徐定祥注：《杜審言詩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南明〕張煌言：《張蒼水詩文集》，《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
- 〔清〕六十七：《使署閒情》，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臺灣文獻叢刊》第122種。
- 〔清〕季麒光撰：《蓉洲詩稿》，康熙三十三年刻本，上海圖書館典藏。
- \_\_\_\_\_：《蓉洲文稿》，康熙三十三年刻本，上海圖書館典藏。
- 〔清〕范咸等修：《重修臺灣府志》，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清〕高拱乾等修：《臺灣府志》，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列傳》，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90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清〕蔣毓英修：《臺灣府志》，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清〕錢謙益撰：《牧齋有學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部叢刊正編》本，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刊本影印，與《牧齋初學集》合刊本。
- \_\_\_\_\_：《牧齋有學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1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據清康熙二十四年金匱山房刻本影印。

### 〔近人論著〕

- 王建國：〈論沈光文與季麒光之交遊——以東吟社為主要場域〉，《成大中文學報》第70期，2020年9月，頁109-156。
-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全臺詩》第1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年。
- 朱素珍主編：《紀念沈光文論文集》，寧波：寧波出版社，2014年。
- 吳鋒鋼：〈沈光文入台時間考証〉，《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12年第6期，

頁 121-125。

季麒光撰，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

胡亞敏：《敘事學》，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張萍：〈從《蓉洲詩文稿》探究沈光文生平事迹〉，《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25卷第6期，2012年11月，頁51-55。

\_\_\_\_，戴光中，張如安等著：《沈光文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

寧波同鄉月刊社：《沈光文斯菴先生專集》，臺北：富信行印刷廠，1977年。

劉昭仁：《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臺北：秀威科技，2006年。

樂承耀編著：《台灣文獻初祖沈光文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

潘承玉：《南明文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龔顯宗編：《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

\_\_\_\_編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編——紀念沈光文誕辰400年》，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2年。

# Extraordinary Life and Ordinary Lives: O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i Qiguang and Shen Guangwen-A Research Based on the Period Before and After the Dong-Yin Poetry Society

Wang, Chien-Kuo\*

## [Abstract]

In 1651, Shen Guangwen (沈光文, 1612-1688) took his family from Jinmen to Quanzhou by boat, and after encountering a hurricane, came to Taiwan. After being successively ruled by the Netherlands, Ming Zheng 明鄭 and the Qing Dynasty, his life underwent tremendous changes.

In 1684, Ji Qiguang (季麒光, 1634-1702) came to Taiwan to serve as the first Zhuluo 諸羅 magistrate official. Shen Guangwen met him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e Tianfei Shrine (天妃神宮) instantly becoming confidants with similar temperaments. They constantly exchanged poems with each other, and established the first poetry society in Taiwan called “Futai Xianyong” (or “Tung-Yin Poetry Society”).

In particular, Ji Qiguang said: “No one lived in Taiwan before Si'an's arrival; Taiwan had no culture before Si'an's arrival.” Shen Guangwen also said: “I also regard myself as the first overseas person, and think of you as my overseas confidant.” Thus confirming the deep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This article explores new material and adopts new methods to shift from the work of Ji Qiguang to focus more on Ji Qiguang's the acceptance and interpretation of Shen Guangwen. It will also explore and present the subject-matter of “intertextuality” and “mutual justification”. Firstly, it delves into the so-called extraordinary life which is the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acquaintance between Ji and Shen, using the biography of Shen Guangwen and related content to discuss the exact time of coming to Taiwan, his being summoned and his image writing. Secondly, the so-called ordinary life focuses mainly on the period shortly before and after the “Dong-Yin Poetry Society”, to investigate circumstances of the exchanges of poetry and prose, and at the same time outlines Ji’s official tour in Taiwan as well as Shen Guangwen’s life in his later years.

**Keywords:** Ji Qiguang, Shen Guangwen, Dong-Yin Poetry Society, Zhuluo magistrate, Rongzhou Poetry Manuscript, Official Tour

